



青年自学丛书

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

 星火出版社

青年自学丛书

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

（资本主义部分）

《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编写组编

星火 出版社

（二〇二一·四 北京）

出版：星火出版社
发行：马恩百科资料库
编辑：《上海青年自学丛书——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
编写组

排版设计：CR.Z

校对：CR.Z

网址：<https://www.mebk.org>

联系方式：mebk_org@hotmail.com

开本：1/32

页数：

版次：2021年4月重排第1版

印次：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青年自学丛书》编辑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

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广大知识青年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线，坚定地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断涌现，一代革命青年正在茁壮成长。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特编辑、出版这套《青年自学丛书》。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实用农业技术知识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学习起积极作用，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更好地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我们对大力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的有关单位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改进。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学一点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1]学一点政治经济学，对于弄通马克思主义，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自觉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都是十分重要的。

战斗在农村、工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广大青年要使自己能更好地进行战斗，更快地健康成长，就更需要学一点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呢？这首先要从它的研究对象谈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恩格斯明确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2]。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是怎样发生的呢？这就要从人类的生产活动谈起。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3]但是，在一百多年前，当马

[1] 转引自 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2]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3 页。

[3]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259 页。

克思主义还没有产生的时候,人们是没有这个科学认识的。剥削阶级的许多思想家,都否认这一点。他们不是鼓吹人类社会是按照上帝旨意发展的邪说,就是散布英雄创造历史的迁论。这些所谓的思想家,抹煞了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有吃、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人们要吃、穿、住,就必须进行生产活动。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人类就不能生存,社会就不能发展。这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马克思发现的。

要生产,人们就要结成一定的相互关系,孤立的个人是没法进行生产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联系,才会有生产。”**^[1]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这种关系,就叫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关系归根到底表现为阶级关系。

生产关系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 and 他们的相互关系;(3)产品分配形式。所有制形式就是指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如机器、厂房、土地和劳动对象如原料等)归谁所有的问题。在生产关系中,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最为重要,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不同来划分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并由此决定产品的分配形式。

要生产,不仅人和人之间要发生关系,而且人和自然界之间要发生关系。人们要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就叫生产力。生产力是由人和物(即生产资料)这两个因

^[1]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素构成的。在生产力中,生产工具是重要的因素。使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反映着人们征服自然能力的大小。但是,我们不能把生产工具看成是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1],“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2]。因为工具要通过人来创造,通过人来使用,通过人来革新。没有人,就没有工具,没有技术;工具不同人结合,再好的自动机,永远也“自动”不了。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构成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任何种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一种生产关系不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就必然要被另一种能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这就是说,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而是受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制约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定的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是在同一一定的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展开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的时候,要联系到生产力进行研究。

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是不是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完全是被动的、消极的东西呢?决不是的。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的时候,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时候,它对生产力的发展就会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生产

[1]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487页。

[2]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401页。

力遭到极为严重的束缚和破坏。解放前，中国不仅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钢的年产量除东北外只有几万吨。连人们的一般生活用品也大多是从外国来的。布叫洋布，伞叫洋伞……，连小到一枚铁钉，也叫洋钉。在这种情况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具有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了。

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变革以后，这是一个普遍规律。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大发展，也只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使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土崩瓦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起来以后才出现的。比如英国，在十七世纪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又发动了工业革命，才使生产力得到大发展。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也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先改变了旧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以后，现代工业才迅速发展起来的。

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上，是坚持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论，还是宣扬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林彪伙同陈伯达鼓吹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在我们国家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它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它还有不完善的方面，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则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改革了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以后，才能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哪里有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呢？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鼓吹这种谬论，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以唯生产力论为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反对党的基本路线。这当然只能是一种痴心妄想。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打破同它不相适应的旧的生产关系，而代之以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但是，旧的生产关系的消灭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不可能是顺利无阻的。旧生产关系的变革，新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完善，总要通过革命斗争才能实现。所以，要了解旧的生产关系是怎样被变革的，新的生产关系是怎样建立和完善的，仅仅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来说明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关系来考察。上层建筑是指国家政权、军队、法律等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马克思的这一论述，科学地阐明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中，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才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改变了，**“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这就是说，旧的经济基础瓦解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土层建筑必然要随着瓦解，但是它的瓦解是有快有慢的。反动的国家机器变革以后，被推翻的反动没落的阶级并不随着旧的经济基础的消灭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还要在政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同先进阶级进行长期的、殊死的斗争。特别是同没落的阶级相联系的旧的意识形态，还会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着。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一旦建立以后，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2] 同上书，第83页。

对经济基础就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斯大林指出：“**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¹⁴这就说明上层建筑只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客观上早已要求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资产阶级掌握着反动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为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无产阶级如果不首先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新老修正主义者鼓吹的什么“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在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一面是基本的。但是，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以及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等等，这些，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完善和发展，又是起阻碍甚至破坏作用的。我们要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就必须狠抓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政治经济学涉及各个阶级和阶层最现实、最切身的利益，它阐述了最尖锐和最激烈的阶级斗争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公开申明它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阶级斗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诞生的。马克思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实践，运用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

¹⁴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4 页。

解剖。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科学地论证了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就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日益发展，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无产阶级的日益强大，**“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从而，得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要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的、科学的结论。**“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2]这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道，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这条基本的政治路线，指引着无产阶级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毛主席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论证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并且在这个理论上，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2]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9页。

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1]党的基本路线，指引着我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斗争。

毛主席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还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2]商品制度、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深刻认识这些问题，对于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重要意义。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学一点政治经济学，可以使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同一切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根本对立的，而且是在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使我们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纠正不正之风，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

总之，为了战胜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为了更好地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地夺取新的、更大的胜

^[1]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58 页。

^[2] 转引自 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利，需要学一点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证明和运用。学习政治经济学，也必须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指导。“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这种无产阶级世界观，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根本对立的。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运用它来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才能懂得资本主义一定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运用它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才能懂得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箱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才能懂得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总趋势。这样，必将增强我们的信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

学习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2]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一个革命学风问题，也是一个党性问题。学习政治经济学，要同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动谬论结合起来，要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要同改造世界观结合起来。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3]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2]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773页。

[3] 转引自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为武器，自觉地抵制“资产”风，同资本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进行不懈的斗争。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没有困难呢？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就：“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分析中，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进行科学的象。我们在开始学习时，会碰到一些名词概念，往往不容易理解。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写的，讲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是可以逐步理解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1]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2]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为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我们应该以他们为光辉榜样，勤奋地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学习！

^[1]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65页。

^[2]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

二、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制度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三种社会形态。了解这些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更替，对于帮助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特别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的历史规律，有重要的意义。

原始公社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产关系

原始社会是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作为起点的。人类社会的产生和人的产生同时出现；有了人，就开始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大约已有一百万年的历史了。人的祖先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类人猿。类人猿是怎样变成人的呢？关键在于劳动。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当类人猿在向人转变的过程中，能把天然的东西改造成为适用的工具，当他们只在用一块石头敲打另一块石头，制造出石刀、石斧，或者把树枝加工成棍棒这样一些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的时候，一个伟大的革命发生了：人脱离了动物界，依靠自己的双手制造工具，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漫长的劳动过程中，人逐渐学会了制

造石头的工具，学会了狩猎和捕鱼，发明了弓箭，特别重要的是火的发现和使用，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恩格斯高度评价这一伟大成就，他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从这时开始，人类社会正式在地球上出现了。

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以后进行的生产活动，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活动。“**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人类揭开社会历史帷幕的最初时期，人们之间的这种生产关系，是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生产关系。

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是按着血统关系结合在一起进行劳动的氏族公社。氏族公社所有制是原始的公有制，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为全体公社成员共同占有。那时，人们使用石力、石斧、石矛以及弓箭等简陋的工具，只有依靠共同劳动，才能同强大的自然力量作斗争，因而还不可能出现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情况。这种氏族公社所有制，是人们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条件下，所能采取的唯一形式。氏族公社共有的生产资料有生产工具、土地、森林、河流、牲畜等等；武器和弓箭则由个人携带和使用。

在原始社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们在劳动中按照性别和年龄实行自然分工：男人外出打猎，老人制造工具，妇女采集植物、管理家务和从事原始农业，儿童帮助妇女作些辅助劳动。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原始的互助合作关系。

在氏族公社所有制和共同劳动条件下，对产品采取平均分配的原则。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共同劳动所得的产品，除了勉强维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以外，没有什么剩余；如果不采取平均分配，就会饿死一部分氏族成员，甚至使氏族公社解体。

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也产生了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原始社会先后出现过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这样两个阶段。母系氏族的形成，最主要的原因是妇女在生产活动中比男子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妇女主要经营原始农业，男子主要从事狩猎活动；而狩猎是带有季节性和偶然性的，农业则是比较可靠的生活资料来源。因此，社会生活自然以女性为中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脱离了原始状态，畜牧业同农业分离，男子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增强了；并且随着以妇女为中心的群婚制向对偶婚姻制的过渡，妇女逐步处于从属地位，父系氏族出现了。

氏族设立的全体成年人参加的氏族议事会，是氏族公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氏族议事会选举族长和战时军事首领，讨论和决定一切重大事件。美国学者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过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公社：“它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军事首领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族关系结合起来的同胞。”氏族公社这种上层建筑，对于氏族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北京郊区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的社会，是我国原始社会的最初阶段。我国许多地区发现的原始社会遗址和文物，证明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到内蒙古、黑龙江、新疆、西藏、广西、四川、云南等地，都曾有过母系氏族部落。大约在五千年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部落逐渐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我国夏代以前，原始社会存在了几十万年。

历史事实证明，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私有财级，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它有力地驳斥了所谓私有财产和阶级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谬论。

在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

分工。最初是畜牧业同农业分离开来，有的部落专门从事畜牧业，有的部落专门从事农业，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来，手工业又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这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特别到原始社会末期，铁被人们发现了。铁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高级的阶段，但是对原始社会来说，却使它处在解体的前夜了。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各种生产部门的出现，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也出现了。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人们获得的产品除了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以外，逐渐有了剩余。两次社会大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剩余产品逐渐增多，社会财富逐渐增加。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的可能性具备了；另一方面，随着交换的扩大，氏族首领逐渐把公社的财产变成自己的私产的可能性也具备了。金属工具特别是铁制工具——铁斧、铁锄、铁犁等的使用，使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为一家一户单独进行生产创造了条件。原来以氏族为单位的集体生产，逐步分解成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生产由公共的事情变成了各家的私事，生产工具和产品等也就变为私有财产。接着，原来属于公有而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的耕地逐渐演变为私人所有。私有制出现了。原始公社制度逐渐瓦解了。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必然引起各个家庭财产的不平等。氏族首领不断利用职权把公社财产化为私有，成为氏族里最富有的家庭。同时，这些富有的家庭一方面由于财富的增加，经营范围的扩大，感到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使用奴隶劳动开始成为可能和有利的事。于是，战争中的俘虏不再被屠杀，而是作为奴隶使用了。随后，氏族内部的一些贫民也变成了富有家庭的奴隶。人剥削人的现象出现了。生产的发展，交换的扩大，产生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货币。货币产生以后，富有家庭就利用货币放高利贷，集中社会财富，加剧了财产的不

平等。这样一来，一方面，财富迅速集中在为数很少的奴隶主手里；另一方面，广大劳动群众因为贫困和破产，大批地被迫沦为奴隶，使奴隶人数急剧增加。于是，社会分裂为阶级：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这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就是这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随着阶级的产生，原来氏族议事会也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宰，变为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工具。这时，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国家产生了。从这时开始一直到现在，“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奴隶制是历史上最古老的剥削制度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而且占有奴隶。奴隶只是作为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受奴隶主的绝对支配。奴隶不仅被剥削，而且被当作牲畜、当作祭品和当作商品买卖，甚至随便被奴隶主杀死。奴隶劳动是公开的强迫劳动。奴隶主用暴力迫使奴隶做工，任意对奴隶施加各种残酷肉刑。为了易于把逃跑的奴隶抓回来，奴隶主还在奴隶的身上烫上烙印，加上枷锁。奴隶主剥削奴隶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使用了最残暴的手段。奴隶所创造的产品全部归奴隶主所有，奴隶主对待奴隶的生活，以不饿死为限度。这就是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

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我国自夏代以后就进入了奴隶社会。在殷代，“众人”、“畜民”等都是奴隶。殷墟（殷代都城的废墟，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出土的奴隶陶俑，手上都有手铐，男的铸在后面，女的铸在前面。这是当时奴隶生活的反映。至于屠杀奴隶，更是骇人听闻。奴隶主经常把奴隶当作祭祀用的祭品，殷代祭祀有时竟杀人一千以上。从殷代奴隶主的墓葬中，还发现有被活殉或者被杀殉的奴隶，少则十多人，多达几百人，其中有男有女，

甚至还有儿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奴隶社会是不容怀疑的。

但是，托派分子陈伯达之流却散布所谓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谬论，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划分的普遍真理，进一步为他们所谓的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制造根据。这是极其反动的，也是枉然的。

最早的古代城市，出现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是在部落联盟的中心地区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为了防御。在奴隶社会形成以后，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城市同乡村的对立出现了。

当时，工业产品就是手工业品，城市是手工业集中的地方。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是同商业的发展相联系的，因此，城市又是商业活动的中心。在我国殷代，商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商业城市已经出现了。现在的殷墟，在当年就是殷代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城市。

奴隶主建立了同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城市就成为奴隶社会的政治中心。奴隶主特别注意在城市中强化国家机器，用以镇压奴隶的反抗。许多奴隶主、大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都集居在城市，过着荒淫奢侈的寄生生活。奴隶主还出于享乐的需要，强迫奴隶在城市修建辉煌的宫殿、庙宇、剧场等各种公共场所。于是城市也就逐渐发展成为奴隶社会的文化中心。

这样，奴隶社会的城市就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处于支配乡村的地位，造成了城乡对立。城乡对立是阶级矛盾尖锐的产物，它的特点是城市剥削乡村。

在原始社会，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参加劳动，没有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到了奴隶社会，情况就不同了。由于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创造出大量的剩余产品，就使得奴隶主有可能完全脱离生产劳动。这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也有了需要和可能。这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立的性质。享受文化教育是奴隶主阶级的特权，**“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

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奴隶主阶级千方百计地散布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竭力利用他们的政治、法律、哲学思想作为统治奴隶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工具，来巩固奴隶主专政。

奴隶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它的出现，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在奴隶制度下，一般不再大批杀戮战争俘虏，而是把俘虏保存下来做工，这是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的。由于奴隶主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于是组织某些比较大规模的生产和协作就有了可能。随着金属工具的使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农业已成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马、牛、羊、鸡、犬、豕等六畜都已经成为人们饲养的家畜。我国殷代依靠大批手工业者的劳动协作，已经能够制造重达一千四百市斤、横长一百一十厘米、宽七十七厘米、带耳高一百三十七厘米的铜祭器（司母戊大方鼎），而且铸有精美的花纹，由此可以推断出当时发达的生产水平和工艺水平。

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生产关系一开始就同生产力的发展存在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广大奴隶不堪忍受奴隶主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大量怠工，大批逃亡，经常破坏生产工具。奴隶主一方面加强对奴隶的镇压和迫害，造成大量奴隶的过早死亡，一方面则给奴隶使用笨重的不容易破坏的工具。但是这样一来，又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度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还在于这种制度造成了对体力劳动的鄙视，破产的小市民宁愿流浪，也不愿去从事体力劳动。这一切表明，奴隶制的灭亡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了。在奴隶社会的末期，逐渐出现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原来土地由奴隶制国家占有，是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我国殷周时代，土地国有采取了井田制的形式，凡属于井田范围的田都是所谓“公田”。这种“公田”连同奴隶由全国最大的奴隶主——天子分配给下面的奴隶主即诸侯、卿、大夫等使用。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一些奴隶主就命迫使奴隶在所谓“公田”

之外开垦大批的“私田”，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私田”的不断增加，导致了“井田制”的破坏。这时，地主阶级出现了。他们提出“废井田，开阡陌”的口号。奴隶也逐渐地变成了隶农。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滋长起来了。

奴隶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这两大阶级之外，还有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是一些自由生产者。奴隶阶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遭受奴隶主阶级的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整个奴隶制时代，充满了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正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那时有一位名叫柳下跖的奴隶起义领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并当面痛斥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丘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是生非”的“巧伪人”，是“罪大极重”的“盗丘”。奴隶起义猛烈地冲击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在世界各国，奴隶起义都写下了许许多多壮丽的史诗，如在古罗马由斯巴达克领导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奴隶起义，参加者达到十二万人。这次起义震撼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基础。风起云涌的奴隶起义给了奴隶主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奴隶制度的崩溃。在奴隶制度灭亡的过程中，封建的生产关系逐渐成熟。代表封建生产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利用了劳动人民的力量，摧毁奴隶主王朝，建立了地主阶级政权，使封建制度最终取代了奴隶制度。

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我国，当这个新旧社会大变动的时候，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孔丘，竭力反对这种变革，把生产关系的大变革说成是“天下无道”，坚决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任何改革措施；鼓吹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旧制度办事，妄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奴隶主专政的残局。可是，大势已去，这不过是徒劳的垂死挣扎罢了。

封建制度是又一个阶级对抗的剥削制度

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和不完全地占有农奴为基础的。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农奴或农民很少或完全没有土地，依靠耕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这样，他们就被紧紧地束缚在封建的土地制度之下，从而失去了人身自由，受着地主阶级的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向农民出租土地收取封建地租。封建地租一般有三种形式：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

劳役地租也叫徭役地租，盛行于封建社会的初期。所谓劳役地租，就是地主规定农民在一定的时日，带上自己的生产工具，到地主直接经营的土地上为地主干活。农民替地主干完了活以后，才能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劳动。在这种地租形式下，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是清清楚楚的。农民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劳动，劳动产品归自己所有，对劳动是感兴趣的，农民在地主直接经营的土地上劳动，劳动产品全部归地主所有，当然没有劳动热情。封建地主也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们为了强制农民在地主直接经营的土地上努力劳动，就蒙养一批监工，对农民进行奴隶般的强制。因此，在这种地租形式之下，压迫和被压迫、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也是一目了然的。在封建社会的初期，生产力水平还是很低的，地主如果不依靠直接的强制，便不能剥削到农民的剩余劳动。这种封建地租形式曾经受到了农民的激烈反抗。

后来，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地主阶级出于既能加强剥削、又能掩盖剥削的目的，就采用实物地租的形式以代替劳役地租。在实物地租形式下，农民已经不是在地主的直接监督下劳动了，也不必到地主直接经营的土地上干活了。这时的农民，可以支配自己的全部劳动。但是，要定期用实物的形式向地主缴纳剩余产品。这种地租形式同劳役地租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改善技术，

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促进作用。但是，实物地租丝毫也没有减轻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这种实物地租往往要占到农民收成的一半，甚至七成、八成以上。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农民就不得不摸星星，赶月亮，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即使这样，农民也还无法摆脱极端贫困的生活。

货币地租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那时的生产力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提高，商品货币关系相当广泛地发展起来了。封建地主为了满足自己各方面豪华奢侈的生活需要，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货币地租。在货币地租的形式下，农民将自己的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换得货币再向封建地主缴租。这样，农民就不仅要受封建地主的剥削，而且还要受商人的中间剥削。有时丰收了，可是“谷贱伤农”，商人拚命杀价以榨取农民的血汗。因此，农民的生活更加处于悲惨的境地，随时有破产的危险。

在封建社会，广大农民除了受封建地租的剥削以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十分沉重的贡税，还要受到高利贷剥削。地主同官吏、军队勾结在一起，抢掠农民的田地，榨取农民的钱财，强迫农民从事其他无偿劳动，使广大农民遭受种种超经济的剥削。

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初期，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那时，农民生产的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劳动工具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铁制工具的应用也相当广泛，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都有所增加，手工业也日益发展。我国战国时代，就兴建了四川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经过历代整修，至今仍然发挥着很大作用。我国封建社会的煮盐、金属冶炼、丝绸、纺织、陶瓷、刺绣等手工业相当发达，指南针、火药、纸张和印刷术很早就得到了发明。

但是，封建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的生产。这种小规模生产，是不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的。特别是广大农民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下，受着残酷的剥削和

压迫，很少有发展生产的可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反映到阶级关系上就集中表现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这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广大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进行武装斗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种起义和斗争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在我国，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第一个封建集权国家不久，就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此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历时两千多年，总计大小数百次，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是，叛徒陈伯达之流却把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说成是封建统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的结果。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历史上，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起义，从来没有“让步”过，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对农民进行血腥镇压、反攻倒算，根本谈不上什么“让步”。叛徒陈伯达之流鼓吹的“让步政策论”，完全是美化地主阶级的谬论。

在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封建社会的简单商品生产，是以私有制和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进行交换。小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必须拿到市场上出售。但是，一方面，由于各个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条件、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各不相同，因而，他们生产同一类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同类商品又只能按照同一价格出售，这是一个矛盾。随着这个矛盾的发展，一小部分生产条件优越的小商品生产者，就逐渐富裕起来，而大部分生产条件较差的小商品生产者，就入不敷出，渐渐贫困下去。这样，便引起了简单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

在封建社会，同一地区、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为了抵制别的

地区、别的行业手工业者的竞争，为了限制同一行业手工业者之间的竞争，一般都建立行会。参加行会的手工业者必须共同遵守行会的规程。在手工业行会内部，有行东、帮工、学徒等等级。行东同帮工、学徒的关系，主要是封建的宗法性的师徒关系，行东对帮工、学徒有轻微的剥削。这种行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部分较富裕的行东就不顾行会规程的限制，任意增加帮工和学徒，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改进生产技术，并且逐步地把自己的帮工和学徒变成了雇佣工人；另一部分破产的行东及其帮工和学徒，也陆续加入了雇佣工人的队伍。

在两极分化的基础上，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在小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中，商业资本起了很大的作用。商人原来是商品交换的中介人，后来又充当包买商，包买商品生产者的产品，并发展到直接将原料甚至劳动工具等发给小生产者，要后者按期、按质、按量、按品种、按规格替他们生产商品。这时，小商品生产者就完全被商人所控制，变为雇佣工人；而商人自己也就变为工业资本家了。

封建社会后期的农村，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逐渐实行货币地租，这就日益增加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加速了农民的分化过程。大多数农民逐渐破产沦为雇农，少数人则上升为富农，转化为农业资本家。

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便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成长起来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形成过程，是同生产力的发展密切地联系着的。在开始的时候，手工业者的小作坊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大作坊，在这种作坊里，仍然进行着手工劳动，但同一资本指挥下的许多工人在一起劳动，可以实行简单协作，形

成一种新的生产力。以后，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又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的特点是：在企业内部生产同一种商品的工人实行分工，即每个工人专门从事一种操作，协作就建立在这种分工的基础上。它使劳动操作简单化，使工人的劳动更加紧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为用机器代替手工操作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要有大量的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第二，还需要有大量的货币财富的积累。为了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就使用暴力创造这两个基本条件，因而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有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

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是剥夺农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先发展起来的英国，就是一个典型。从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初期的三百多年中，英国统治阶级发动了著名的“圈地运动”，用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英国现代工业首先是从毛纺织业兴起的。毛纺织业的发展，需要大批羊毛，造成羊毛价格的上涨。大地主和农场经营主为了赚钱发财，就到处圈地养羊，用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并且拆毁和焚烧了他们的房屋，剥夺了大批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圈地运动”逼得广大农民离乡背井，流浪各地，以乞讨为生。接着，英国统治者又颁布各种血腥法律，禁止农民流浪，强迫他们在苛刻的条件下接受雇佣劳动制度。

对货币财富的掠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种重要方式。

欧洲资产阶级凭借武力进行远征，到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建立殖民制度，发动商业战争，掠夺殖民地的物质资源、货币财富，为建立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而积累货币资本。

因此，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用暴力强迫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并把货币财富集中在资本家手里变成资本的过程。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对于直接生产者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①。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有力地证明了资本家不是什么

“勤俭起家”，而是完全靠掠夺起家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的产生和发展，受到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严重阻碍，不能在封建社会取得支配的地位。因为，封建统治阶级是决不愿意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总是要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拼命地维护已经过时的封建制度。这时，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就起来制造舆论，鼓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倡导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谴责封建制度，为发动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作舆论准备。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主要的阶级力量是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于是资产阶级充当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

在旧中国，由于它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是官僚资产阶级，它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一起，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它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另一方面又同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是民主革命的一种力量，但同时又有很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

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是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的革命，但是这一革命也有反复，在革命的进行过程中贯串着封建阶级企图复辟和资产阶级反对复辟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英国从一六四〇年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两次内战，才处死了代表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一六六〇年，代表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世又实行复辟。到一六八八年，英国资产阶级从荷兰请来

了一位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再次推翻斯图亚特王朝，才开始把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法国从一七八九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到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经过了八十六年，中间交替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尽管如此，但由于封建制度已经腐朽了，不论它多么疯狂挣扎，仍然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封建生产关系，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三、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从商品开始

——商品、货币、价值规律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要从分析商品开始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不仅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是商品，连人的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在这里，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商品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在商品中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因此，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必须从分析商品开始。

商品关系蕴藏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

商品是用来交换和出卖的劳动产品。它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原始公社，人们共同生产，获得的产品全部用于原始公社成员自己消费。在这种条件下，是没有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是在原始公社末期开始出现，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慢慢地发展起来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发展到最高峰。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商品，有哪些基本的属性呢？商品既然是供交换的劳动产品，它首先必须对人们有某种用处，如大米可以充饥，衣服可以保暖，钢铁可以造机器，拖拉机可以耕地等等。商品的这种有用性，叫做使用价值。很明显的，一样东西，如果对别人没有使用价值，没有人需要它，它就不能成为商品。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一个基本属性，但并不是唯一的属性，并不是一切有使用价值的东西都是商品。如空气、阳光，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但它们不是劳动产品，人们可以自由取给，不能成为商品。又如，粮食、蔬菜，虽然是劳动产品，但如果是农民自己生产供自己食用的，那也不成其为商品。再如，封建制度下的农民，把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向地主缴纳地租，这些粮食虽然不是农民拿来供自己消费的，但它是无偿交给地主的，并不经过买卖交换，因而也还不是商品。

供他人使用，并通过交换而进入消费领域的劳动产品，才成为商品。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的属性以外，还具有同其他产品相交换的属性。商品的这种可以同其他产品相交换的属性，叫做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数量上的比例关系。例如，一丈布换二十斤米，二十斤米就是一丈布的交换价值。

两种商品交换的数量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这种比例大体上总是一致的。这种交换比例究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很显然，各种商品能在交换中建立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说明它们之间，必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从使用价值方面来看，各种商品是不同质的，例如，布可以做衣服，米可以充饥，这是两种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因而是不能比较的。各种商品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必须从使用价值以外去寻找。而各种商品，布也好，米也好，把它们的使用价值撇开，他们就只剩

下了一种性质，那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在生产它们的时候，都耗费了人的劳动。这种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形成了价值。各种商品作为价值，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在数量上就可以互相比较了。一丈布所以能够换二十斤米，就是因为生产一丈布和生产二十斤米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因此，它们在价值上能够相等。所以，交换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价值则是交换价值的基础。

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它们构成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一种东西如果没有使用价值，不管人们花了多少劳动在上面，也不能形成价值，不能成为可以同其他劳动产品相交换的商品。同时，只有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才能成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一种东西，如果没有人的劳动花在上面，尽管它的使用价值是人们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如象上面讲过的空气或阳光，也不能成为商品。

商品的二重性，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追溯下去，就可以发现原来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是具体劳动，另一方面是抽象劳动。

为着生产出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人们需要进行各种各样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例如，木匠做桌子，农民种粮食，各有不同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方法。木匠的劳动是运用锯子、刨子、斧子等工具，对木材进行加工，最后做出桌子来。农民的劳动是运用各种农具，经过耕、耙、种、收等劳动形式，最后生产出粮食来。这种在各种具体形式下支出的劳动，叫做具体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千差万别，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也千差万别。各行各业的具体劳动都不一样，体现着复杂的社会分工。

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是不同质的，是不能比较的；但在市场上，各种劳动产品却可以相互比较。这说明，生产商品的劳动除了作为具体劳动这不同的一面以外，一定还有相同的一面。

这种相同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尽管生产各种商品的劳动，在具体形式上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即总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也就是人类体力、脑力的消耗。这种撇开其具体特点的、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就叫做抽象劳动。商品的价值就是抽象劳动创造的。我们前面说，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形成价值。现在，在分析了劳动的二重性以后，就可以对价值的含义作更确切的说明了：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是两种不同的劳动，而是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人们必须进行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使用价值，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具体劳动体现着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抽象劳动却不同，它提供一个统一的尺度，用来比较不同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耗费。所以，抽象劳动体现着商品生产条件下人和人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

商品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而劳动量则是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生产一种商品的劳动时间愈长，所耗费的劳动量愈多，这种商品的价值量也就愈大。

那末，这是不是说，一个人愈懒惰，技术愈不熟练，他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愈大呢？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

生产同一种商品，各个商品生产者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不等的。有些人技术比较熟练，有些人不那么熟练有些人使用的工具和设备比较先进，有些人的工具和设备比较落后。技术熟练、工具先进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比技术生疏、工具落后的商品生产者要少得多那末，商品的价值量究竟是按照哪一种劳动时间来决定呢？

各个生产者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叫做个别劳动时间。譬如，木匠制造桌子，有的人耗费三十小时，有的人耗费二十五小时，有的人耗费二十小时。这三十小时、二十五小时、二十小时，都是个别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不决定于个别劳动时

间，而是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假定，在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按照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制造一张桌子需要耗费二十五小时这二十五小时，就是生产桌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十五小时的劳动量，就是决定桌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量。

在谈到劳动量决定价值量的时候，不但要区别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还必须区别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所谓简单劳动，就是不必经过特殊的培养和训练，只要是一个健康的健康的人都能从事的劳动所谓复杂劳动就是必须经过一定的培养和训练，具有一定专长的熟练劳动者的劳动。所以在同样的时间内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要小些，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要大些。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同简单劳动的换算，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自发地进行的。

以上，我们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以及商品价值量方面的一些问题。在有了这些基本认识以后，就可以来进一步分析商品生产的矛盾了。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不是为了他本人需要那种商品，而是为了把它出卖，换回他所需要的商品。例如铁匠打锄头，并不是因为他需要用锄头。他所关心的，是把锄头卖掉，实现锄头的价值，以便换回他所需要的米、布等商品。商品能否卖得出去，这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讲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

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物，生产商品的劳动也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对立的统一。它们既统一于一个商品之中，又存在着矛盾。如果商品能卖得出去，商品内部的矛盾就解决了。因为锄头到了需要它的农民的手里，具体劳动就转化为抽象劳动，铁匠获得了锄头的价值。锄头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就统一了。如果

商品卖不出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就立即暴露出来了。锄头虽然分明具有使用价值，但是卖不出去，它的价值就无法实现，锄头就等于是一块废铁铁匠的具体劳动分明也是体力和脑力的耗费，但是却不能转化为抽象劳动，也就是他的劳动不被社会所承认，等于白费了。在这种情况下，铁匠也就无法购买生铁煤炭进行再生产，当然也无法购买柴米、油、盐来维持生活。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直接关联着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和生活。

商品生产的这种矛盾是怎样产生的呢？它的根源何在呢？

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有一种矛盾，叫做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商品既然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生产者所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既然不是为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而是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有社会性的，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生产者个人的私事。因此，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又具有私人劳动的性质。这种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一切矛盾的根源。私有者生产的商品，拿到市场上卖出去了，这表明他的私人劳动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的具体劳动也就不能转化为抽象劳动，商品的价值也就不能实现。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二重性的分析牢固地创立了劳动价值的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说明了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则创造商品的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产阶级在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之前，不明白自己苦难的根源，认不清斗争的目标，有些人误以为自己的苦难是机器

造成的，曾经用捣毁机器的方式来开展斗争。马克思总结无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经验，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这样就使无产阶级认清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正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根本不可能建立剩余价值的理论。

正是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千方百计地制造出各种反科学的价值理论，妄图割断价值和劳动的联系，来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在资产阶级庸经济学家中，曾经流行过一种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理论。这种理论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生产费用（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工资）来决定的。如果商品的价值真的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话，那末，资本家把商品卖出去，收回的也只是他所耗费的生产费用，他怎么能发财致富呢？他对工人的剥削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主张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庸俗经济学家们，总是要把资本家的利润说成是一种比较高的工资，禁欲的报酬，冒险的奖赏等等，从而暴露出他们的资产阶级辩护士的丑恶嘴脸。

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中，还曾经流行过一种效用价值论。按照这种理论，商品的价值视商品的效用大小为转移。

而“效用”又是什么呢？其实无非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我们前面说过，作为使用价值，各种商品都是不同质的，是无法比较的。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商品的价值，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效用价值论者根本不能回答，为什么象空气和阳光这些就其使用价值来说，对人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却根本没有任何价值，不能作为商品出卖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中，也流行过一种供求价值论。

这种理论否认商品有客观的内在价值，而认为商品的价值是

由商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当某种商品供过于求时，它能换到的其他商品就少些，它的价值就小些；求过于供时，就能换得多些，它的价值就大些。这种谬论也显然是错误的。

供求价值论者根本不能回答当供求一致时，商品的价值由什么决定；也不能回答在各种商品的供求关系变动中，为什么有些商品总是要比另一些商品贵些。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千方百计想否定劳动价值论，但真理是否定不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同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伪科学理论的斗争中，证明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

讲到商品，就会联想到货币。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商品的价值都是用货币来表现的，商品都是要用货币去购买的。但是，商品的价值并不是一开始就用货币来表现的。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

商品交换最初是直接的物物交换。最初，游牧部落和农业部落相互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例如，羊交换米。这时的商品交换还只是偶然的行爲，还只是发生在氏族公社和氏族公社之间。在交换过程中，一种商品的价值，偶然地表现在另种商品上。比如说，2只羊=1袋米，羊的价值从羊本身是看不到的；但是当羊同米相交换的时候，羊的价值就从米的身上表现出来了。在上面的等式中处在米的地位上的商品，已经开始具有特殊的作用，它已经起着“等价物”的作用了。它好象一面镜子，从它身上可以反映出另一种商品的价值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交换日益发展，参加交换的商品品种越来越多。在交换中，一种商品可以同许多种商品相交换，它的价值，可以反映在其他许多种商品上面。

同时，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物物交换的缺点也越来越明显

因为直接的物物交换，必须要求交换双方恰巧都需要对方的东西，才能交换成功。例如，有羊的人，希望用羊换粮食，但有粮食的人不需要羊，却需要锄头。但是有锄头的人，既不需要羊也不需要粮食，却需要布。如果有布的人正好需要羊，那末，出卖羊的人，经过用羊换到布，用布换到锄头，然后再用锄头才能换到粮食，几经周折，才能实现预期的交换目的。如果有布的人也不需要羊，那么有羊的人虽然费了很多的周折，仍然无法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在商品生产发展的条件下，直接的物物交换是困难的，是很不方便的。

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把自己需要换出的东西，先换成某种比较普遍需要的商品（比如羊），再用它来换入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样只要经过两次交换，就能够达到交换的目的。所以，在商品交换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如羊这样的商品，就会渐渐地从其他一切商品中分离出来，起着其他商品所不能起的作用：一切商品都首先同羊相交换，然后再用羊换得任何其他商品。这时，一切商品都用羊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羊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就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了。

在长期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不同的民族曾经有过不同的一般等价物，如羊、贝、布帛、金属等等，但是最后都落到贵金属——金、银身上。这是因为，小量的金、银具有大量的价值，便于携带，而且它们久藏不坏，便于分割，最适宜于充当一般等价物。这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银就成了普遍采用的货币。金、银并不天生就是货币，只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才成为货币。

从货币的起源，我们也就看出了货币的本质。货币就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货币的本质体现在货币的职能上。货币有五种职能，这些职能是在商品交换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些职能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它们是随着货币的产生而产生

的。

货币的第一种职能是价值尺度。正如尺子是用来衡量其他物品长短的尺度一样，货币是用来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子。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货币，可以只是观念上的货币。这就是说，当人们用货币来衡量商品的价值的时候，并不需要手持现金。

比如，一张桌子价值十元，并不需要把十元现金摆在桌子上，只要在桌子上面贴上十元的标签就可以了。当商品的价值用货币来表现的时候，这就是商品的价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商品的价格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商品本身的价值，一是货币（金、银）的价值。商品的价格同商品本身的价值成正比，同货币的价值成反比。例如，一头牛的价值是五百小时社会劳动，一两黄金的价值也是五百小时社会劳动，这时，牛的价格就是一两黄金。假定黄金开采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两黄金的价值降低到了二百五十小时社会劳动这时，虽然牛的价值丝毫未变，仍是五百小时社会劳动，但是，牛的价格却上涨为二两黄金了货币的第二种职能是流通手段，就是充当商品流通的媒介。所谓商品流通，就是用货币做媒介的商品交换。在货币出现以前，商品和商品直接交换，用公式来表现，就是：商品—商品。货币出现以后，一切商品都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用公式来表现，就是：商品—货币—商品。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这种媒介作用，就是货币的流通手段的职能。

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最初是一块块大小轻重不等的金块或银块，后来才逐渐为铸币所代替。所谓铸币不过是经过国家证明的具有一定形状、成色和重量的金属铸块。各国的铸币不同。我国在商朝末年，就已经开始用铜制造铸币，最初的铸币是一种铜制的、形状象农具的布钱；到了周朝，除布钱外又有了刀钱和圆钱等；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开始铸造银元，每个银元含有零点七二两白银。

铸币在流通过程中逐渐磨损，丧失掉一部分价值。在这时候，

铸币的价值虽然不足，它仍然同足值的铸币一样通用。这是因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只是转瞬即逝的事情。人们拿商品换取货币，是为了用这些货币买回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商品所有者首先关心的是货币能否充当流通手段，而不是货币本身是否足值。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不仅不足值的金属货币可以充当流通手段，而且它还可以用纯粹是价值符号的纸币来代替。

由于纸币在商品流通中是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因此，纸币的发行量，就必须以流通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为限度。马克思指出：“**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如果纸币的发行量相当于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则纸币就同金属货币具有相等的购买力 y 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则全部纸币仍然只能代表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因而单位纸币所代表的金属货币量就会减少，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会上涨。例如，在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为一亿元，但纸币的发行量却达到二亿元，那末，纸币就要贬值一半，一元纸币的购买力只能相当于零点五元的金属货币。

这种由于纸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金属货币量而引起的纸币贬值，叫做通货膨胀。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货膨胀是资产阶级国家掠夺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通货膨胀的结果，是纸币贬值，物价上涨；而工人货币工资的增加远比物价的上涨要缓慢得多，因而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生活水平下降。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剥削收入却急剧地增长了。在旧中国，伪法币的发行数量曾经达到了惊人的数字，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狂涨。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伪法币一百元的购买力，在一九三七年为二头牛，一九三八年为一头牛，一九四一年为一头猪，一九四七年为三分之一盒火柴，而到一九四八年时，就连三分之一根火柴都买不到了。

货币的第三种职能是贮藏手段。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得

货币日益成为社会财富的代表。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财富的积累采取了贮积粮食、布匹、绸缎等等实物的形式。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以后，因为货币可以购买任何一种商品，财富的积累便日益采取贮藏货币（金、银）的形式来进行。这种暂时从商品流通中退出，被所有者贮藏起来的货币便成为贮藏货币，具有贮藏手段的职能货币的第四种职能是支付手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使得赊账买卖也日渐发展起来。赊账到期时，就需要用货币来支付欠款，但在这时，商品交换早已完成，货币在这里已经不是充当流通手段，而是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最初只是在商品生产者之间用于清偿债务，后来越出商品流通领域，在支付地租、利息、税收等方面也发挥了这种职能。

货币的第五种职能是世界货币。随着商品交换越出一国的范围，产生了国际贸易，于是也就产生了货币的新的职能即世界货币的职能。只有黄金或者白银，才能充当世界货币。

在世界市场上，黄金首先是作为一般的支付手段，用来平衡国际贸易的差额。这是世界货币的主要职能。其次，在世界市场上，黄金也作为一般的购买手段，用来购买各种商品。

再其次，黄金还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由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比如，在支付战争赔款、输出资本或由于各种原因而把金、银转移到国外时，就是起着这样的作用。

货币的上述五种职能，是有机地联系着的，是货币本质的不同表现，是一般等价物在商品流通发展过程中各个不同方面作用的表现。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规律。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要按照

价值量进行交换，即要求等价交换。只要存在着商品经济这个条件，价值规律就必然要发生作用。马克思说：“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这就是说，在商品交换中，尽管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商品交换的比例是不断变动的，交换双方的两种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量）不可能恰好相等，但是作为一种长期的趋势来看，商品交换必然是等价交换，双方交换的价值量应该是相等的。

为什么商品交换的客观趋势必然要求等价交换呢？这是因为，商品生产者都非常关心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商品交换的比例不断变动，这时，人们对于比较有利的那种商品，就会尽可能地去扩大生产，而对于比较不利的那种商品，将会缩减生产。结果，前一种商品产量增加，供过于求，交换价值下降；后一种商品产量减少，供不应求，交换价值上升，各自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过去。商品交换比例的这种不断变动，正巧说明，等价交换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货币出现以后，商品交换都以货币为媒介，价值表现为价格。价值规律要求等价交换，就是要求价格和价值相符。当然，价格和价值相符，也是作为一种客观趋势来讲的。事实上，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由于生产的盲目性，市场上商品供给和需要是经常脱节的，因而引起价格时涨时落的变化。虽然供求变化引起价格上下波动，但它总是围绕着价值这个轴心转的。所以，这种供求关系引起价格和价值的背离，不是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正是价值规律借以发生作用的必要形式。

价值规律对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主要有下列三方面的作用，这些作用是通过市场竞争的自发力量实现的。

第一，价值规律是生产的调节者，它自发地调节着各个生产

部门之间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的分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是在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中进行的，谁都无法直接知道社会上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但某种秩序、某种调度和安排，却是社会生产继续进行所必需的。这种调度和安排就是靠价值规律的调节，依靠市场价格涨落的自发作用来实现的。某种商品如果供给不能满足需要，价格就会涨到价值以上，生产这种商品就特别有利可图，于是这种商品的生产就会扩大。反之，某种商品的价格就会跌落到价值以下，这种商品的生产就会缩小。价值规律就是这样地指挥着商品生产者的活动，调节着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虽然使私有制的商品经济能够建立某种秩序，但这种秩序，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实现的，它不断地被盲目的竞争所破坏，又重新自发地形成新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是以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为代价的。正如马克思说的：“**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

第二，价值规律刺激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拿单位时间中所生产的产品数量来衡量的。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text{劳动生产率} = \text{产品数量} / \text{劳动时间}$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主要有：劳动的熟练程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它在生产上的应用，分工和协作的发展程度等。根据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商品是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来售卖的，因此，谁在技术上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比较高、个别劳动时间愈是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获利也就愈多。这种状况就促进商品生产者关心技术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在私有制下，商品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是为了追求更多的收入，那些拥有新技术的商品生产者就必然要保守技术秘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受到阻碍。

第三，价值规律促使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这是因为，各个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不一样，生产同一种商品所花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千差万别。但是，价值规律要求商品按照由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决定的价值出卖。这样，那些生产条件较好的商品生产者，个别劳动时间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获利较多，发展就快。相反，那些生产条件差的商品生产者，个别劳动时间大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竞争中就要遭到失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

揭开商品拜物教之谜

拜物教本来是指人们迷信某种物具有神秘的力量，而加以崇拜的一种宗教。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时，由于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很薄弱，在自然力面前软弱无能，因此把自然力神秘化起来，以为象雷、电、水、火这样的自然界力量，有什么神灵在那里主宰着，因而拜倒在它们脚下。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商品本来是人们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东西，但它却被看成为凌驾于人们之上的，具有支配人们命运的力量。这种现象，马克思把它叫做商品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是怎样产生的呢？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条件下，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商品似乎凌驾于人们之上，统治着人。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完全和商品的命运联结着。他的命运完全要看他的商品能不能卖得出去，能不能卖得一个好价钱。如果商品卖出去了，而且价钱很有利，商品生产者的日子就好过了。如果商品卖不出去，或者价格大跌，商品生产者的日子就很不好过。商品生产者事先无法知道他的商品究竟是否有人要，是否能卖得一个好价钱。商品的价格不由生产者个人决定，而由价值规律在市场上的自发势力所左右。正是这种状况，使商品生产者感到他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商品在市场上的遭遇。

在货币出现以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能同一切商品相交换，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货币本身具有一种特殊的魔

力，能支配人的命运。所以，商品拜物教必然会发展到货币拜物教。

马克思首先揭穿了商品拜物教的谜。马克思的商品货币关系理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看到物和物之间的关系的方面，都揭示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揭露出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着的人们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理论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商品货币关系并不是永恒的东西，而是一种历史现象。从而，以商品作为细胞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决不是永恒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东西，必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消灭，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和压迫工人的？

——资本和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要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只有用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武装，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认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发展规律，懂得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成为无产阶级自觉的革命战士。

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都有一部血泪斑斑的家史。回想旧社会，工人“吃的猪狗食，千的牛马活”，“做工做到老，不及一根草”，政治上受压迫，生活上无保障，日子越过越苦。这是为什么？而那些资本家，成年不劳动，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过着花天酒地、腐朽糜烂的生活，财产却越来越多，这又是为什么？马克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第一次揭露了这个秘密，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是怎样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的呢？这就得先从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谈起。劳动力就是人

的劳动能力，即一个人具有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在任何社会，劳动力都是生产的要素，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才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第一，劳动者是“自由人”，所谓“自由人”，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不受任何拘束或限制地当作商品来出卖；第二，劳动者是“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过日子。这两个条件，是在封建社会崩溃，小商品生产者日益分化，以及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资本家雇用工人，就是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把工人变成资本家的雇佣奴隶。

劳动力既成为商品，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和和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也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资本家要工人干活，就要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而要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工人就得吃饭、穿衣、住房子，就要有生活资料。所以，劳动力的价值，首先包括维持工人自身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时，工人是会衰老、死亡的，资本家要维持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需要有新工人补充，所以，在劳动力的价值中，还不得不包括工人生儿育女养活家属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资本家为了要更多地剥削工人，一般都要求工人掌握一定的技术。工人要掌握某种技术，就得受一些教育和训练。这样，在劳动力价值中又不得不包括一定的教育或训练的费用，但这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一般来说，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为生产以上这些生活资料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至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则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具有特殊的性质。其他一切商品如粮食、衣服等等，当它们的使用价值被消费掉的时候，不会创造出新的价值来。而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的使用，即工人进行劳动的时候，却能创造出价值，并且能够创造出比劳动力本

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来。“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这个差额就叫剩余价值。

那末，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呢？现在我们就具体地来考察一下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以后，就迫使工人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做工，为资本家生产商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它既是劳动过程，又是价值增殖过程。

劳动过程，是人们通过自己有目的的活动，借助于一定劳动手段，去改变劳动对象，使它适合于满足人们的某些需要的一种过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点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在资本家的支配下进行劳动，劳动成果归资本家占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结果，生产某些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资本家让工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不提供一定使用价值，商品就不会有人要，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在内）也就不能实现。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又是价值增殖过程。工人在生产使用价值的时候，同时也用他的活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工人新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这就叫做价值增殖。这种价值增殖是资本家所追求的终极目的，价值增殖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导方面。

以生产棉纱为例，资本家先购买了足够一个工人一天劳动十二小时所需要消耗的生产资料，假定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四十八小时的劳动量，合二十四元；再购买了工人一天的劳动力，假设一天劳动力的价值等于六小时劳动量，合三元。然后进入生产过程，叫工人纺纱。资本家购买的既然是一天的劳动力，就不会让工人一天只劳动六小时。假定这个工人一天劳动十二小时。这样，生产出来的棉纱的价值就等于六十小时的劳动量，合三十元。其中，二十四元是生产资料转移过来的价值，六元是工人劳动十二小时新创造的价值。资本家在这次劳动过程中只拿出了二

十七元，其中，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是二十四元，用于支付工资的是三元。多出来的三元，就是价值增殖，这就是工人劳动所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价值增殖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以上所发生的一切，都仍然是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的。

但是，价值却增殖了，剩余价值产生了。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取得了对劳动力的使用权。“**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货币所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他所有。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资本家工厂越开越大，财富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大超过劳动力价值的这个差额，被资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剩余价值是在生产领域中工人所创造的。可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为了掩盖剥削工人的本质，硬说资本家所得的新价值是从流通领域中来的。对于这种谎言，我们必须加以彻底揭露。

剩余价值既不可能用买者低于商品的价值买进商品来说明，也不能用卖者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卖出商品来说明，因为每个人通过这样的途径所造成的赢利或亏损，都将由于相互交替地成为买者和卖者而抵销。剩余价值也不能用欺骗来说明，因为欺骗虽能牺牲一方，而使另一方获得好处，但不能增加双方所拥有的财富的总数。“**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要说剩余价值同流通领域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生产资料和销售商品，这同流通领域分不开。在流通领域，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为生产剩余价值提供了条件；资本家通过销售商品，使剩余价值得到了实现。但不管怎样，剩余价值只能在生产领域产生，决不会在流通领域产生；剩余价

值只能是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工人的产物。

在明白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以后，我们就可以认识资本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了。资本，就是一种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或者说它是一种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资本不是一个单纯的物，它体现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阶级关系。

资本所体现的这种关系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生产资料和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前早就存在了，但它们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当它们为资本家占有，并用作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手段时，才成为资本。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硬说生产资料就是资本。按照这种说法，原始人使用的石块、木棍也竟成了资本。他们制造这种谬论的目的，就是企图用物的关系来掩盖人和人的阶级关系，掩盖资本剥削的本质，否定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自古就有的、永恒不变的制度。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时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这个剩余价值规律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没有剩余价值的生产，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榨取工人的血汗，达到赚钱发财的目的。赚了千钱想万钱，对剩余价值的贪得无厌，是资本家的本性。“**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个人剥削人的罪恶制度。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制造了种种谬论来欺骗群众，说什么工人受冻挨饿是由于“命苦”，资本家发财致富是由于“勤俭”，等等。这完全是骗人

的鬼话。资本家不劳动，不捏榔头，不开机器，怎么说得上“勤”？他们成天花天酒地，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又怎么说得上“俭”？在旧社会，工人所以穷困不堪，决不是因为“命苦”，而是因为工人劳动创造的成果大部分被资本家掠夺去了。一句话，工人的穷，资本家的富，是从同一个根子上来的，那就是以资本家私人占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工人的残酷手段

资本家是资本的化身，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资本家是吸血鬼，只要工人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他就决不罢休。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总是挖空心思用尽各种手段，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我们从剩余价值率可以看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程度。

要了解剩余价值率，说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程度，首先必须了解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

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被消耗，失掉它原有的使用价值，但是，它的价值并没有丧失，而是借助于工人的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上去了。不过，这种转移不能增加任何新的价值。因此，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资本，叫做不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反，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由于工人的抽象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超过了工人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实现了价值增殖，所以叫做可变资本。剩余价值正是可变资本增殖的产物。

我们用 c 代表不变资本， v 代表可变资本， m 代表剩余价值，那末，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就等于 $c+v$ ，产品总价值就等于 $c+v+m$ 。既然 c 在生产过程中不改变它的价值， m 只是 v 增殖的结果，所以，要表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程度，就应该撇开 c ，单独拿 m 去对 v 比。以 m 对 v 的比率，即号，就是剩余价值率。以前面所举

纺纱作例子， v 是三元， m 也是三元，反映资本家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一就是 100%。

我们从价值的增殖过程可以看出，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用来再生产可变资本的价

值（即工资）的，这一部分劳动时间，是维持工人自身的生活所必需的，叫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部分是用来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叫做剩余劳动时间。因此，剩余价值率又可表示如下：

$$\text{剩余价值率} = \frac{\text{剩余价值} (m)}{\text{可变资本} (v)} = \frac{\text{剩余劳动时间}}{\text{必要劳动时间}}$$

资本家总是拼命提高剩余价值率，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最普遍采用的一种手段是延长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总和。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劳动时间越长，剩余劳动时间也越长。假定原来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是十二小时，其中六小时是必要劳动时间，六小时是剩余劳动时间。现在资本家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十五小时，必要劳动时间不变，仍是六小时，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却变成了九小时，比原来增加了三小时。这样，剩余劳动时间对必要劳动时间的比率就从 6: 6 变成 9: 6，从而剩余价值率由 100% 提高到 150%。这种由于每天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

在旧中国，工人劳动时间之长是惊人的。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五、十六小时，甚至十八小时以上，“起五更；睡半夜，两头见星星”，是常见的。解放前，天津三条石各厂的工人，每年要劳动三百五十七天，每天二十小时左右。假如按八小时工作制计算，则相当于每个工人每年要做八百九十三个劳动日，一年的劳动，实际上做了近三年。为了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资本家想出种种苛刻的办法，如规定吃饭不许超过十分钟，上厕所必须领牌登记，

甚至还玩弄倒拨时钟这一类极其卑鄙无耻的伎俩。工人劳动时间越是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就越多，资本家榨取的绝对剩余价值量就越大。在资本家残酷剥削下，劳动力的这种过度支出，使工人身体受到严重摧残，造成过早死亡。

资本家用延长劳动时间来加重剥削，虽然是个顶省事的办法，但是，它必然要引起工人的反抗；同时，资本家也不能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变为劳动时间，因为工人劳动力的支出毕竟有一个生理限度。于是，资本家又采取比较隐蔽的手段，即用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

怎样才能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呢？我们知道，必要劳动时间是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劳动力价值又取决于维持工人及其家属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如果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新机器，使社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从而使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降低，那末，工人一天的总劳动时间虽然未变，但是因为劳动力的价值降低了，就能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假定原来的

必要劳动时间是六小时，剩余劳动时间也是六小时。现在，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一倍，工人及其家属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会降低一半。这样，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就从六小时缩短为三小时，而剩余劳动时间则从原来的六小时变成了九小时，比原来增加了三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对必要劳动时间的比率由 6:6 变成了 9:3，剩余价值率由 100%

提高到 300%。这种由于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个别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新机器，强迫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能降低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也不能马上达到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目的。既然如此，资本家又为什么要采用新技术、新机器呢？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新机器的直接动机，是为了把他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降低到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以下，以便他在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出卖商品时，可以比别的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由于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获得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它叫做超额剩余价值。但是，首先采用新技术的资本家是不会长久地获得这种超额剩余价值的，因为别的资本家看到他赚的钱多，也会跟着这样做。当新技术、新机器被普遍采用，劳动生产率得到普遍提高以后，商品的价值就会降低，原来产生超额剩余价值的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额就消失了，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这样一来，劳动生产率已普遍提高，许多商品的价值就相应降低，构成劳动力价值要素的生活资料便宜了，劳动力价值就会降低，必要劳动时间就会缩短，结果，资本家又能榨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

贪得无厌的资本家除了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来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外，还通过提高劳动强度，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进一步榨取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因此，它们都能缩短工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其等价物所必需的工作日部分。**”资本家用加速机器运转、提高劳动定额、减人不减活等方法，来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工人的劳动更加紧张、更加繁重，一天劳动下来，体力上处于瘫痪的状态。如上海申新纱厂，一九三三年每万锭纺纱机雇用工人四百四十人。这个厂的资本家为了同日商纱厂竞争，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强迫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减少工人人数，到一九三四年降为每万锭纺纱机只雇用工人二百七十人。在旧社会，工人在资本家的逼迫下，被过度的劳动折磨得不象样子，一到四十岁，许多活就干不动了，造成未老先衰。

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鬼花样是很多的，压低和克扣工资也是他们常用的手段。我们上面在分析剩余价值时，是假定资本家按照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支付工资的。但是，实际上工人的工资往往

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总是力图降低工人的工资，即使工人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也要想尽办法进行克扣，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使工人连最低的生活水平也不能维持。如开滦煤矿曾明文规定：骡马每天草料费四角七分，而矿工的日工资却不超二角二分。真是“人不如骡马”。而且，在旧中国，许多工厂都订有一套专门对付工人的罚规，巧立名目来处罚工人，有时罚款甚至超过工资。例如，所谓随意倒水要罚，在窗口向外看也要罚，集会、结社等等更要罚。而这些罚款最后都落入资本家的腰包，成为资本家的生财之道。

资本家还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进行更加残酷的剥削。在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的条件下，工人的工资经常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而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低。在旧中国，女工每天同样干活十几小时，而工资一般只有男工的三分之二或一半。童工的工资更低，往往只有女工工资的一半。有的资本家对童工只供给一点粗劣的伙食，根本不付工资。资本家把“养成工”和“包身工”根本不当作人。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从那些必须靠人放到凳子上才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丝来。**”儿童处在长身体受教育的时期，但是在资本家的折磨下，吃不饱，穿不暖，还要经常挨打受骂。大量童工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下，面黄肌瘦，病的病，死的死，受到严重摧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不仅残酷地剥削工人，而且专横地压迫工人。在旧中国，许多工厂的资本家都订有各种压迫工人的厂规，有的多到几十条甚至一百多条，严重侵犯工人的人身自由。什么“上下班要抄身”、“厂方有权开除工人”等等。这样的工厂就象一座座监狱，而工人则成了囚徒。有的资本家甚至在工厂里驻扎军警，专门镇压工人。

资本主义制度给工人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这是一种罪恶的剥削制度。可是，叛徒刘少奇却竭力替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鼓吹反动透顶的“剥削有功”论，说什么“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这完全是一派胡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是对“剥削有功”论最有力的批判。刘少奇一伙妄图在社会主义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只能暴露他们一伙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丑恶嘴脸！

工资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做工，从资本家那里取得工资。从表面上看，工人劳动一天，资本家给一天工资，劳动一周，给一周工资，好象工人的全部劳动都得到了报酬，是一种“平等的交易”。实际上，工资的形式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马克思指出：“**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资产阶级鼓吹工资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完全是一个虚假的范畴。

这里的关键在于，要把劳动力和劳动区别开来，这“**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商品买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

为什么劳动不是商品，不能成为买卖对象呢？这是因为：第一，如果劳动是商品，它就应该象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必须在出卖以前就已经存在。但是事实上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它不是在出卖之前就存在的，而是在工人出卖劳动力之后，在劳动过程开始以后才存在的。并且，这时工人的劳动已经不属于工人，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因此已不能由工人来出卖了。第二，如果劳动是商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就必须是等价交换，资本家就应该把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当作工资付给工人，来购买工人的劳动。但是这样一来，资本家就失去了发财致富的源泉，就等于取消了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就不存在了。第三，如果劳动是商品，它也应该有价值，这价值又是由什么来决定呢？我们知道，一切商品的价值，就是由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如果劳动的价值，也是由劳动量来决定，其结果就是由劳动来衡

量劳动了。这是同义反复。

由此可见，劳动不是商品，没有价值。“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向工人购买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部分，而工人劳动创造出来大大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其余部分，即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剥削去了。因此，资本主义工资反映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雇佣和被雇佣、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资本家通常是用货币支付工资的。工人出卖劳动力，取得一定数量的货币，这种用货币来表现的工资叫做名义工资。货币的数量不能表明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只有用货币工资实际能够买到的生活资料数量，才能表明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这种表明工人实际生活水平的工资，就叫实际工资。

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并不总是一致的。在名义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工资可以下降。当货币的购买力降低，引起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时，同样的名义工资额所能换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就会减少，实际工资就会下降。有时名义工资虽然略有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小于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的幅度，实际工资仍然下降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实际工资时时呈现下降的趋势。资产阶级总是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增加房租等手段，扩大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差距，加重对工人的剥削。

在旧中国，“工资增加象蜗牛，物价上涨象气球”。蒋家王朝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和搜刮民脂民膏，拚命加快印钞机的运转，使通货膨胀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二年间，钞票发行额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旧中国的工人，吃尽了通货膨胀的苦头。在蒋家王朝灭亡的前夜，每逢领工资的日子，“拿了工资向外跑，穿过马路两三条，米价已经跳三跳”。在旧中国，工人不但拿的工资少，能够买到的东西更少，三钱不值二钱，难以养家糊口。有时经过

罢工斗争，名义工资也可能加一点，但是物价涨得更快，工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恶化。更何况，旧中国房租昂贵，即使你住的是破草棚，狠心的房地产资本家，也要刮你三寸地皮。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天下乌鸦一般黑”。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剥削手法，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实际工资的下降，使广大工人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工人阶级必然起来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而斗争。

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反对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展开争取提高工资的经济斗争，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不仅暂时延缓实际工资的下降，而且通过这种斗争，可以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锻炼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但是，我们不能夸大经济斗争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应当忘记：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因此，工人阶级要求得彻底解放，决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必须把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可是，形形色色的工贼却竭力鼓吹：工人只要搞经济斗争就行了。按照他们的谬论，工人阶级就根本没有必要用暴力革命去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只要增加一点工资，改善一些待遇就应该满足了。这一小撮工贼鼓吹这种谬论，就是妄想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引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邪路，妄想要工人阶级永远当资本家的雇佣奴隶。“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五、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越来越悬殊

——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

资本家千方百计地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在更大的规模上剥削和压迫工人。这种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懂得，在旧社会，为什么从来不劳动的资本家，财富会越来越多，而每天辛勤劳动的工人，生活却越过越苦。并且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剥夺者被剥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的，而推翻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资本积累加深了对工人的剥削

我们前面说，资本家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就是资本积累。现在，在分析资本积累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如果资本家不是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而是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完全花在购买个人消费上，结果又会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的生产就不能扩大，只能进行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

假定有个资本家，开厂时有资本 10,000 元，其中，8,000 元用于购买厂房、原料和机器设备（为简单起见，假定这 8,000 元生产资料在一年中全部消耗掉，其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去），

2,000元用于购买劳动力。又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那末，一年产品的价值就等于 $8,000c+2,000v+2,000m=12,000$ 元，其中剩余价值是2,000元。资本家把获得的这2,000元剩余价值，都用于个人和家属的奢侈消费，因此，当第二年的生产开始时，资本家手中的资本仍旧是 $8,000c+2,000v=10,000$ 元。假定剩余价值率没有变化，第二年的产值仍旧是 $8,000c+2,000v+2,000m=12,000$ 元。在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规模并没有扩大，仍旧保持原有的水平。这种在原有生产规模上的再生产，就是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可以明白地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是谁养活谁。假如我们单从一个生产过程来看，资本家拿出预付资本来发工资，好像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资本家正是这样宣传的。但是，只要从再生产过程来看，资本家的这种谎言马上就被戳穿了。工资只是工人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在工人新创造的价值中，不仅包括着养活工人自己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而且还包括着养活资本家的、供资本家吃喝玩乐的剩余价值。所以，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恰恰相反，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

其次，从简单再生产过程还可以看出，资本家的资本，总是从剩余价值转化过来的。拿我们上面所举的例子来看，这个原来拥有10,000元资本的资本家，每年在个人消费上要耗费2,000元。这样，只要经过五年时间，就把他原有的10,000元资本全部吃光用光了。但是，通过简单再生产，五年以后，他手里仍有10,000元资本，这10,000元资本早已不是他原来的那笔资本，而是在五年中陆续榨取的剩余价值的总和。马克思说：“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的资本，既然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过来的，那末，当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生产资料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就是完全合理的，这不过是收

回了工人阶级祖祖辈辈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罢了。

最后，从简单再生产过程还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仅再生产着各种商品，而且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再生产过程中，工人不断地生产出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又不断地生产出剩余价值使资本家得以生存并保持住他原有的资本。在生产过程终了时，工人仍然是两手空空的雇佣劳动者，资本家仍然拥有着剥削工人的一切必要手段。

以上，我们是假定资本家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全部花费在他的个人消费上，因此，再生产就只能按照原来的规模反复进行。但是，简单再生产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扩大再生产。

要进行扩大再生产，资本家就不能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而必须留出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用于添置新的机器、设备和雇用新的工人，才能扩大生产规模，实现扩大再生产。

假定资本家投入生产时的资本是 10,000 元，其中不变资本 8,000 元，可变资本 2,000 元，剩余价值率 100%。生产过程结束，产品价值是 $8,000c+2,000v+2,000m=12,000$ 元。

再假定资本家在 2,000 元剩余价值当中，拿出一半用于个人消费，另一半用于积累，转化为新的资本。这 1,000 元新资本，如果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分配比例仍同原来的一样，那末，新增的不变资本是 800 元，新增的可变资本是 200 元。因此，在第二年，资本总额就增加到 11,000 元，它的构成是 $8,800c+2,200v$ 。如果剩余价值率仍是 100%，那末，第二年产品的价值就是 $8,800c+2,200v+2,200m=13,200$ 元。同第一年的产品价值 12,000 元相比，这个资本家实现了扩大再生产。

从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中，我们可以看到，扩大再生产之所以能够进行，是由于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如果说，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投入的资本，要经过一段时间以

后，才能看出它是剩余价值的转化物，那末，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追加资本在一开始就已经清楚地表明它是从剩余价值转化过来的。

资本家为什么不把剩余价值全部花在购买个人消费上，而要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呢？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积累解释为资本家的“节欲”美德，似乎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了扩大生产而克制着自己的消费欲望。

马克思揭穿了资本家“节欲”的本质。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具有绝对的致富欲”**。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而他只有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增加资本数量，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剩余价值才能不断地增加。同时，资本主义的竞争也迫使资本家不得不进行资本积累。谁的资本越大，他在添置设备、购买原材料、采用新技术等方面，就越有利，就越有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相反，就会在竞争中失败，成为大鱼吃小鱼的牺牲品。竞争对每个资本家来说，成了一种压力。在竞争中失败和破产的恐惧，迫使资本家尽可能地进行资本积累，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可见，不是什么“节欲”的美德，而是贪婪和恐惧驱使着资本家把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资本家剥削得越多，积累的资本就越多；积累的资本越多，反过来又越能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积累不但是剥削工人的结果，而且也是资本家加深和扩大对工人剥削的手段。

工人失业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

资本积累的过程不仅是资本总额增大的过程，而且，在这一

过程中，资本的构成也会发生变化，从而给无产阶级带来严重的后果。

资本的构成，从物质方面来看，表现为生产资料（厂房、机器设备、原料等）和劳动力的对比。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的数量和雇用工人的数量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比例的。例如，一个纺纱工人配备多少纱锭，每天消耗多少棉花，就有一定的比例。这种比例的高低取决于社会生产的技术水平，取决于各生产部门的特点和机械化程度，还取决于各企业的技术装备程度。因此，我们就把这种比例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资本的构成，还可以从价值的角度来观察。生产资料的价值表现为不变资本，劳动力的价值表现为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就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

资本的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般地说，资本的价值构成是随着技术构成的变化而变化的。“**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的公式是 $c:v$ 。比如，有个资本家，他有 10,000 元资本，其中：不变资本 8,000 元，可变资本 2,000 元，那末，这个资本的有机构成就是 $8,000c:2,000v$ ，也就是 4:1。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是固定不变的。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必须改进企业的技术设备，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或用新机器代替旧机器。这样，资本家就必须增加用在机器设备上的资本。由于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将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消耗更多的原料，资本家还必须增加购买原材料的资本。这样，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可变资本的比重却越来越小，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般是以个别资本的增大为前提。资

本的增大有两种具体形式：一种叫资本积聚，即个别资本依靠自身的积累而增大自己的资本总额；另一种叫资本集中，通过竞争，大资本并吞了小资本，或者几个资本联合成股份公司，使原有的分散的资本合并集中成为更大的资本。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必然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工人阶级有严重的影响。如果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的积累就会相应增加对劳动力的需要，即相应增加工人的就业机会。但是当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以后，资本积累的后果就不是这样了。它可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但是这种增加程度要比不变资本增加程度小得多；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使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也减少下来。这是因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是由总资本大小所决定，而只是由可变资本的大小所决定。比如，当资本的有机构成是 4: 1 的时候，那就是每 100 元资本中有 20 元可用于雇用工人。而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为 9: 1 的时候，那就是每 100 元资本中，只有 10 元用于雇用工人。这样，即使总资本从 10, 000 元增加到 15, 000 元，但是其中的可变资本却从 2, 000 元减少到 1, 500 元。这说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减少了就业的机会，给工人带来十分不利的后果。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创造了机器，但是机器被资本家使用的结果，是大批工人被抛上街头，变成了失业者。资本家对缝纫机的采用，使许多缝衣工人失业；对排字机的采用，使许多排字工人失业；对打包机的采用，使许多打包工人失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就业机会相对地减少，失业增加，这就叫机器排斥工人。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但是，在资本积累的进行过程中，劳动力的供应却是绝对地增加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机器的广泛采用，把许多劳动操作变简单了，用不了很强的体力就能做了，结果就使大量妇女、儿童进入了雇佣劳动者的队伍。同时，在资本积累的进行过程中，

大批小商品生产者和小资本家在竞争中破产，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谋生。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也迫使大批农民破产，涌向城市谋求生活。这一切都使劳动力的供应绝对地增加起来。

这样，一方面是对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另一方面是劳动力供应的绝对增加。结果，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存在着庞大的失业大军，造成相对过剩人口。

所谓相对过剩人口，就是说，这些人口，相对于资本的需要来讲才显得是“过剩的”，并不是说，人口已经绝对地过剩，已经超出了社会生产的生活资料所能养活的限度，以致他们真正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其实，世界上决不会有绝对的人口过剩。因为人不仅有一张口，会消耗粮食，而且有一双手，能创造各种物质财富。劳动人民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就可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生活资料，使生活日益丰富多采。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机器设备被当作资本来运用的时候，才把工人抛向街头，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因此，马克思把相对过剩人口称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指出：“**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

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过剩人口有三种基本形式：

第一种是流动的过剩人口。这是指暂时被从生产过程中排挤出来的失业人口而言的。这种失业形态在工业中心最为普遍。在危机时期或当新机器、新工艺被采用以后，就有一部分工人被抛出工厂的大门。但是当恢复时期到来或工业进一步发展时，这一部分失业工人又会有很多人被吸收进厂。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很少有人不曾遭受过失业的。大多数的工人都是时而失业，时而又找到了工作。

第二种是潜在的过剩人口，即农村中的过剩人口。农业资本主义化以后，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农业工人的需要日益减少。而且，在农业中，这种对劳动力的排斥又是绝对的，除非

有新土地的开垦，才有重新吸收劳动力的可能。被资本主义农业排挤出来的劳动者，有些人流入了城市，有些人则往往还守着一小块土地，依靠耕种这一小块土地和做短工来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他们在形式上好象没有失业，但是实际上在农业生产中是过剩的，所以叫做潜在的过剩人口。第三种是停滞的过剩人口。这些人干的是家务劳动或者打零工一类的工作，虽然也算是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职业极不稳定，他们所做的工作往往劳动时间最长，工资却最低，他们的生活水平被压在工人阶级的平均水平以下。在资本主义社会，除了以上三种相对过剩人口外，还有大量依靠救济、乞讨为生的赤贫群众。其中，包括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孤苦儿童，流浪者等等，他们处在相对过剩人口的最低层，生活最贫苦。

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同时，它反过来又成为资本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条件。资本家利用失业工人的存在，作为加紧压迫和剥削在业工人的一张王牌。从资本家的口里，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类恶毒的话：要找一百只狗困难，要找一百个工人容易得很。资本家为什么敢于这样猖狂呢？就是因为工厂的大门外，徘徊着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资本家可以借此来威胁厂里的工人，降低工人的工资。同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常常出现大幅度的收缩和跳跃式的扩大。当生产突然地扩大的时候，资本对劳动的需要，是不可能依靠劳动力的自然增长来满足的。资本家要求有一个劳动力的“蓄水池”，相对过剩人口正是这样的“蓄水池”。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大军又叫做产业后备军。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大军的广泛存在，这对资产阶级来说，既是一件有利于剥削的“美”事，但又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丑事，使所谓文明的国家很不文明。于是，一些资产阶级御用文人便绞尽脑

汁，挖空心思，捏造出一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歪理。十九世纪初，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炮制的反动的“人口论”，就是这样的一种歪理。

马尔萨斯提出一个臭名远扬的论点，说什么人口是按几何级数（1、2、4、8……）增长，而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1、2、3、4…）增长的，这就是人口过剩、人民群众失业和贫困的基本原因。这种说法的用意是企图说明，失业和贫困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而是自然界规律的结果。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战争和瘟疫成了人类社会的福音。因为在战争和瘟疫中，会有大量人口死亡，可以缓和人口过剩，使人口的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增长相适应。

事实胜于雄辩。马尔萨斯反动的“人口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所谓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和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伪科学是怎样炮制出来的呢？原来，马尔萨斯拿美国一个时期的人口增加作为人口增长率的依据，又拿法国一个时期的粮食生产增加作为生活资料增长率的依据。但是，对统计资料的科学分析完全戳穿了马尔萨斯的戏法。美国当时人口的急剧增加，主要并不是由于人口的自然繁殖，而主要是由移民等因素造成的。至于法国的粮食生产，如果拿来同法国的人口增长比较，而不是同美国的人口增长比较，那末，它不是落后于人口增长而是超过人口增长的。法国一七六〇年的人口是2,100万人，粮食产量是平均每人450公升。八十年后，即到一八四〇年，法国的人口增加到3,400万人，即增加了62%，但是粮食生产增长更快，一八四〇年法国的粮食产量增加到了平均每人832公升，即增加了85%。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材料同样可以证明，不是人口的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而是相反，生活资料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但是，尽管这样，劳动人民仍然一贫如洗，日子难过。马尔萨斯妄图用所谓人口的绝对过剩，来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辩解，马尔萨斯“人口论”在旧中国流毒甚广。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一直把马尔萨斯“人口论”当作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工具。解放以前。他们胡

说什么中国人民穷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人口过多，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罪恶推到自然界的头上。全国解放前夕，他们又胡说什么中国人口过多，人民政权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支持不了几个月。毛主席严厉驳斥了这种反动谬论，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社会主义中国建国以来的实践，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这一科学论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我们国家早已消灭了失业现象，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高，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现在已经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预言彻底破灭了。

资本积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

资本积累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在资产阶级方面，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的过程，就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膨胀的过程。在无产阶级方面，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机器排斥工人”的过程，就是失业队伍扩大，在业工人受到日益加重的剥削，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的过程。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社会的一端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端则是贫困的积累。马克思指出：“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马克思揭示这一规律，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它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恶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发展只会造成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而这种贫困化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

国民收入是指整个社会在一年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在资本主义社会，国民收入首先分割为归工人所得的工资和被资本家掠夺去的剩余价值两大部分。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国民收

入中归工人所得的份额和归资本家所得的份额，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国民收入虽然全部由劳动者创造，并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逐步增加，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所得的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总是不断下降，而资产阶级所得的剩余价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总是不断提高。这种状况叫做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美国工人的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八四三年为 45.6%，一八六六年为 43.5%，一八九一年为 42.7%，一九三八年为 37%，九四五年为 33.3%，一九五六年为 29.7%。可见，随着资本积累，工人的收入相对地不断下降，而资产阶级所霸占的财富则日益增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而且还存在着绝对贫困化，这就是列宁所指出的：“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就是说，他们简直愈来愈穷生活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要挤在地窖和阁楼里。”

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失业工人的大量存在。失业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经常面临的威胁。工人一旦失业，失去收入的来源便立即衣食无着，生活陷入绝境。这是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美国，失业工人的人数一九四五年为 110 万人，一九五五年为 2654 万人，一九六八年为 280 万人，到九七一年已上升到 500 万人。在英国，失业现象也十分严重。英国失业工人的人数一九五二年底为 50 万人，一九七二年二月已增加到 160 多万人。

第二，实际工资的下降。资本主义国家在业工人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工人工资往往低于劳动力价值水平，使工人难以维持正常生活。有时经过同资本家斗争，名义工资可能增加一点，但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使货币工资的增加往往落后于物价的上涨，结果实际工资不仅没有增加，甚至还可能下降。例如，据美国官方的统计资料，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七〇年

十二月，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增加 26%但在同期内，美国的生活费用却上涨了 5.5%因此，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 2.75%。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要夺去劳动人民很大的一部分收入。据美国官方的统计资料，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七〇年的三十年间，美国课征的税收已增加了近十六倍。美国的私人负债（包括房屋押款和消费信贷）总额，一九六〇年为 1,978 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负担 1,133 元；到一九七〇年底，私人负债总额增加到 5,779 亿美元，平均每人的负担增加到 2,832 美元。一九七〇年，美国人民用于还债付息的开支，平均占他们全年收入的 22.3%，纳税和还债付息两项开支，每年约占美国人民收入的一半左右。

第三，恶劣的生活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由于实际工资低下，不得不忍受恶劣的生活条件。生活条件的恶劣在居住条件上表现得尤其突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工业生产和人口盲目集中，少数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工人的居住条件也随之日益恶化。马克思指出：“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里曾多次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居住条件的恶化，描写了伦敦等大城市贫民窟恶劣不堪的状况。在今天，资本主义各国大城市里的贫民窟的数目还是有增无减。在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居住在贫民窟的人数，九五〇年为 166.4 万人，一九五七年增加到 257.2 万人。美国一九五九年全国人口约为 18,000 人，其中住在城市贫民窟的有 2,200 万人，住在劣等住宅里的有 4,400 万人废气、废渣、废水等造成的公害，是进一步恶化工人居住条件、危害工人身体健康的严重祸害。工业越发达的城市公害越严重。有钱的资本家可以住在郊区的花园别墅里，受害的还是工人群众。在一些大气污染严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城市，每个居民每年要吸进大量的有害气体。在这一类城市里，肺气肿、支气管炎、哮喘等发病率很高，

死亡率也随之上升。在欧美、日本，因患肺气肿等病而被解雇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

拿医疗条件来说，在美国是“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每看一次病，单是挂号费就要耗去一个中等收入的工人每天工资的三分之一。切除阑尾的手术费，要耗去一个工人两个多月的工资。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要储蓄几个月，才能付出一笔生孩子的费用。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二年，美国的住院费每年平均上涨 12.2%，诊疗费每年平均上涨 6.1%。许多工人就是由于付不起医疗费，往往带病工作，过早死亡。

第四，过高的劳动强度和恶劣的劳动条件。随着资本主义企业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发展，不仅使工人日益成为机器的附属品，而且使工人的劳动强度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一个汽车工人控诉说：“在古老的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即使那些不幸的奴隶，在顺风扬帆的时候，尚能在船橹旁边休息片刻。而今，在传送带旁工作的工人，当机件一个接一个滚滚而来的时候，却没有喘气的时候。”由于资本家用“赶快制度”加紧剥削和折磨工人，美国有些工厂的工人在工作八年到十年以后就丧失了劳动能力，更多的工人到了四十岁左右，就不再适应紧张的工作。由于工作过度紧张和缺乏劳动保护设备，工伤事故层出不穷。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至少有 85% 的美国工人冒着随时受伤的危险在工作，每年有 3% 到 5% 的美国工人因工伤死亡或受重伤。号称世界上科学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样以工人生活的日益贫困，劳动折磨的日益加强作为它存在的条件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理人，企图以一时、一地或一个局部的现象，来否定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是站不住脚的对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首先，我们必须用阶级观点来分析。我们必须把被资产阶级收买的那些工人贵族从工人队伍中剔除出去。一小撮工人贵族从资产阶

级那里分得一点残羹剩饭，他们的生活确是提高了，可是他们已不再是工人队伍的一员，而是无产阶级的叛徒。

对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我们还必须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生活标准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地同过去比。过去皇帝点油灯，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大都用电灯了。如果说工人用电灯，就没有贫困化了，就说今天工人比过去皇帝还要生活得好，这岂不是太荒谬了吗？！

对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我们还必须从全面的观点来看。所谓全面的观点，就是不能看个别工厂、个别地方、个别时期工人的生活状况，而是要从整个工人阶级长期的生活状况来看。这就是说，不仅要看在业工人的生活状况，而且要看失业或半失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不仅要看到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而且要看殖民地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不仅要看资本主义虚假繁荣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而且要看经济危机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这样，就不难看出，个别工厂、个别地方、个别时期工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但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却总是处在日益贫困化的境地。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资本积累的过程，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分散的规模狭小的个体生产变成了社会化的大生产。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生产社会化，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资本家的工厂不同于个体手工业的小作坊。在手工作坊里，是由手工业者独立完成商品的生产过程。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几十个、几百个、甚至成千上万的工人，分布在不同的车间和工段里，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指挥之下，分工协作地完成商品的制造。

第二，社会分工也日益发展。生产越来越专门化，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之间，密切地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厂内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使生产“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机床、汽车、棉布、皮鞋等等产品，都是许多工人共同劳动的结晶，谁都不能说：“这是我的产品。”

生产是社会化了，但是，生产资料和社会化劳动的产品，却不是归社会公有，而是归资本家私有。这样，就产生了社会化生产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严重束缚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只有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程，是不可能自发实现的。依靠资本主义制度安身立命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阻碍这一社会变革。为着实现这一变革，必须有一种社会力量来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这样的社会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处在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是最有觉悟、最有革命彻底性的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下，必然要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是在资本积累的发展过程中日益成熟和壮大起来的。

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不仅是物质生活资料的扩大再生产，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它一方面生产出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方面也生产出更多的雇佣劳动者。所以，资本积累的过程，不仅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准备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即社会化的大生产，而且也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准备了掘墓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

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并在资本积累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强大和觉悟起来。资本积累的发展，使无产阶级队伍逐步扩大；社会化的大生产，锻炼了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促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阶级斗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阶级。

在资本积累的进行过程中，生产社会化的巨大发展，必然会达到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马克思满怀信心地宣布：“**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这就是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六、资本运动的过程是榨取和实现剩 余价值的过程

——资本循环、周转和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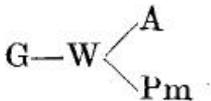
资本要发挥它的作用，就要不断地运动。它从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再从生产过程进入流通过程，如此周而复始。

前面两讲我们是暂时撇开资本的流通过程，专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来考察的。这一讲，我们将着重从流通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运动和它的内在矛盾。

资本的循环要经历三个阶段和采取三种形式

资本在它的运动过程中，依次经过三个阶段，相应采取三种形式。

在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资本家首先要拿出一定数量的货币，到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我们以 G 代表货币，以 W 代表商品，以 A 代表劳动力，以 Pm 代表生产资料，这一过程可以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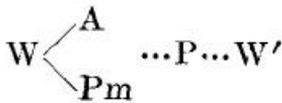


在这一阶段上，资本家手里的货币执行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是，它同时又执行着资本的职能。因为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力和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劳动所必需的生产资料，所以货币在这里就变成了货币资本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货币资本又转化为生产资本。如果没有货币资本，也就没有生产资本，因而也就不能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货币资本的职能是为生产剩余价值准备条件。

在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资本家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进行生产。于是，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断，进入了生产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劳动力被消耗，原材料被加工，设备被磨损，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商品。于是，生产资本就转化为商品资本。

处在这一阶段的商品资本，已经包含着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了。因此，它同购买时的商品相比较，不仅实物形式不同，而且它的价值量已大于原有资本的价值量。

这一过程可表示如下：



这里，P 代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生产资本，P 前后的虚线表示流通过程的中断和生产过程的进行，W' 代表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

在这一阶段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仅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而且也发挥了资本的作用。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而在资本家的手里结合起来的。生产资本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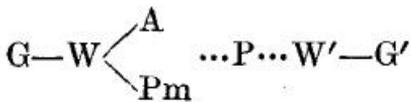
在资本运动的第三阶段，资本家必须把已经生产出来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通过商品的出卖，商品资本又转化为货币资本。这样，资本又重新回到了它原来的货币形式。

这一过程可表示如下：

W'—G'

这里的 G' 是代表已增殖了的货币资本，它既包含着资本家预付资本的价值，又包含着已经实现了的剩余价值。所以，W—G' 不仅是商品价值形式变化的过程，即变商品为货币，更重要的是实现资本家所榨取的、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过程。商品资本的职能是实现剩余价值。

资本运动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和三种形式表明，处在每阶段和每种形式的资本，都执行着独立的职能。在完成一定的职能以后，又依次转入另一个阶段、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种运动中依次转化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所谓产业资本不仅包括工业资本，而且也包括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这种资本依次改变自己的形式，并经过三个不同阶段的运动，使价值得到了增殖，最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这个运动的过程，就是产业资本的循环。它的全过程可表示如下：



在产业资本循环中，第一和第三阶段是流通过程，第二阶段是生产过程。在这三个阶段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过程，因为只有生产过程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在第一和第三阶段，只是资本的形式有变化，并不引起价值量的增减。但是，流通过程对于产业资本的循环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流通过程资本家就不能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因此，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就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也正因为这个道理，产业资本循环三个阶段必须相互连接，不停地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 G—W 受到阻碍，它就会变成贮藏货币，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如果在第二阶段受到阻碍，那末，剩余价值的生产就不能进行；如果在第三阶段受到阻碍，那末，已经生产出来的

剩余价值就不能实现。

资本家要能够不断地榨取剩余价值，就一定要使资本不断地循环下去。这样，产业资本循环的公式，也就成为无止境的：

$$\underbrace{G-W \dots P \dots W'-G'}_{(1)} \cdot \overbrace{G-W \dots P \dots W'-G'}^{(2)} \cdot \underbrace{G-W \dots P \dots W'-G'}_{(3)} \cdot G-W \dots P \dots$$

上述公式表明，产业资本不断运动的过程，并不是只有个循环形态，而是有三个循环形态，即：(1) 货币资本的循环：

$G \dots G'$ ；(2) 生产资本的循环： $P \dots P$ ；(3) 商品资本的循环 $W \dots wW'$ 。资本家要使资本能够不间断地循环，必须使他的资本同时并存于三种形式上，并使处在三种形式上的资本都按照它们的循环形态不间断地运动。例如，一个资本家有六万元的资本，他要把它分为三部分，其中，二万元处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二万元处在生产资本的形式上，二万元处在商品资本的形式上，并使它们不间断地按照各自的循环形态运动。这样，这个资本家才能够在他把二万元的商品资本变成货币资本的时候，同时有二万元的生产资本变成了商品资本，二万元的货币资本变成了生产资本。如果把六万元的资本都齐投放在一种形式上，那末，生产就不能连续地进行，只能间歇地进行。如果三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资本在其循环过程中遭遇到了某种障碍，以致循环中断，例如，商品卖不出去，商品资本不能转化为货币资本，那末，整个资本的循环都会遭到破坏，资本的运动就会中断，资本家就要被迫关门停产。

资本的周转就是不断地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

资本循环不是一次就停顿下来，而是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的。这种从资本连续不断地循环的观点来看资本的运动，就叫资本的

周转。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做资本的周转。”

资本的周转要经历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资本处于生产领域的时间，叫做资本的生产时间，资本处于流通领域的时间，叫做资本的流通时间。两者的总和构成了资本的周转时间资本的生产时间，一般说来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时间。这部分时间，首先是指劳动者为完成某种产品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时间，即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生产部门的性质。例如，纺纱厂每天可以把一定数量的棉花纺成棉纱，而造船厂制造一艘轮船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这样，后者的劳动时间就较前者为长。二是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之间，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生产一个产品的劳动时间就较短，反之，则较长。在有些部门内，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时间，除了劳动时间以外，还包括自然力独立对劳动对象发生作用的时间例如，酿酒需要有一定的发酵的时间，木材加工需要有一定的干燥的时间，农作物要经过一定的自然生长的时间，等等。

第二，生产过程中断，但是生产资料仍留在生产场所的时间。例如，机器、设备等因事故或在夜间停止发挥作用的时间。

第三，生产资料已经进入生产领域，但是还没有加入生产过程，如原材料储存的时间。

在以上几部分时间中，劳动时间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工人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总是力图缩短其他时间，使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尽量接近，从而使一定量的资本在一定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资本的流通时间既包括货币资本变为生产资本的时间即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时间，也包括商品资本变为货币资本的时间，即资本家出售商品的时间。

资本流通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市场上商品供给和需求的情况，取决于生产地点距离市场的远近以及交通条件的好坏等等。

由于各个生产部门、各个企业受到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所以，各个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是不一致的，从而它们的周转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由于各个资本的周转时间不一样，它们的周转速度也就不一样（资本周转速度通常是以年计算的）。假定某个资本家的资本，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和由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流通时间是一个月，资本的生产时间是三个月，这样，资本周转一次就是四个月，一年周转速度是三次。再假定某个资本家的资本半年周转一次，那末，一年周转速度就是二次。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资本的周转速度，归根到底是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所决定的。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假定生产资本的各个部分是全部一次都转变成商品资本的，但是，实际上，生产资本各部分的周转性质和方法是有很大不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生产资本的构成可以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两个部分固定资本是指以厂房、机器设备等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它是一次预付下去，它的实物形式全部参加生产过程供多次生产过程使用，但其价值则随着这些机器设备的逐步磨损，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由于这部分资本价值转移上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我们称这部分资本为固定资本。例如，台机床价值 4,00 元，使用年限为十年。这样，每年就有 400 元的资本价值转移到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去。随着产品的出卖，每年有 400 元资本价值以折旧金的形式回到资本家的手里。这台机床的全部价值要经过十年才转移完毕流动资本是指以原料、燃料、辅助材料等形式存在的和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原料、燃料、辅助材料等在一次生产过程结束时，便失去了原来的实物形式，它的价值全部一次地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并在产品出售以后，以货币的形式全部回到资本家的手中。因此，投在原

料、燃料、辅助材料上的资本称为流动资本。流动资本中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并不是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新产品中同这部分资本价值相等的价值，是由工人新投入的劳动所创造的。尽管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一部分流动资本具有这种特点，但是，从价值周转方法上看，它同用于购买原料、燃料、辅助材料的那部分流动资本却是相同的。因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这部分价值，也是全部一次加入到新产品中去，并随着产品的出售，全部周转回来。因此，用来购买劳动力这部分资本也是流动资本。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于资本的划分方法有两种。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一讲中谈到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是根据资本各部分在生产剩余价值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来划分的。这种划分使我们了解到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增殖的，它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在这一讲中，把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根据资本各部分的周转性质和方法的不同来划分的。这种划分使我们从资本构成方面，了解到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各种因素。

资本的这两种划分方法可表示如下：

按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划分		按周转性质和方法划分
不变资本	{ 厂房和其他建筑物 机器设备 }	固定资本
可变资本	{ 原料、燃料、辅助材料 工 资 }	流动资本

前面我们谈到，固定资本的价值是根据固定资本磨损的程度逐渐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的。这种磨损对固定资本转移价值的大小及其周转速度发生直接的影响。为了进一步研究固定资本周转的特点，还应该分析固定资本的磨损。

固定资本的磨损，由于发生的原因不同，可分为有形磨损和

无形磨损。有形磨损首先是由于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引起的；其次，是由于自然力作用引起的，如木头要腐烂，铁要生锈等等。所以，这种磨损又称物质损耗。无形磨损是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得生产同样机器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从而使原有固定资本价值降低了；也由于出现了新的、效能更高的机器设备，引起了原有机器的贬值。这种使原来的机器贬值所造成的磨损称为精神损耗，又称无形磨损。资本家为了避免这种无形磨损，总是竭力用延长劳动日，提高劳动强度，实行轮班制等手段，加速固定资本的周转，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以便尽快地收回固定资本的价值。

由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和速度各不相同，所以，当我们谈到某个资本的周转速度时，总是指资本的总的周转速度。预付资本的总的周转速度是由资本的各种成分的平均周转速度来确定的。计算它的公式就是用预付总资本去除一年内的资本周转总额。下面是全部预付资本总周转的表，各项数字都是假定的。

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	价 值 (元)	一年周转 次 数	一年周转总额 (元)
固 定 资 本	100,000	1/10	10,000
其中：厂 房	30,000	1/30	1,000
机 器	60,000	1/10	6,000
小 工 具	10,000	3/10	3,000
流 动 资 本	50,000	4	200,000
全 部 预 付 资 本	150,000	1.4	210,000

从表中可以看出，用全部预付资本 150,000 元去除资本周转总额 210,000 元，则得出预付总资本的周转速度是每年 1.4 次。还可以看出，生产资本的构成对资本的周转速度有很大的影响。固定资本的周转速度慢，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快。

因而，前者所占的比重越大，总资本的周转速度就越慢；后者所占的比重越大，总资本的周转速度就越快。

资本的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很大的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加快，不仅可以节省资本的预付数量，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快流动资本中可变资本的周转，从而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假定两个资本家各有可变资本 2,000 元，剩余价值率都是 100%，但是，甲资本家的资本每月周转次，他在一年中可以获得剩余价值 24,000 元；而乙资本家的资本半年周转一次，他在一年中则仅获得剩余价值 4,000 元。他们的剩余价值率虽然相同，但是，年剩余价值率（一年里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对一年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总额的比率）却是不一样的：

$$\text{甲资本家的年剩余价值率是：} \frac{m}{v} = \frac{24,000}{2,000} = 1,200\% ;$$

$$\text{乙资本家的年剩余价值率是：} \frac{m}{v} = \frac{4,000}{2,000} = 200\% .$$

因此，乙资本家和甲资本家虽然预付的可变资本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是，在一年中甲资本家比乙资本家的资本周转速度快了六倍，因而一年中得到的剩余价值也就多了六倍。

资本家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缩短资本的周转时间，即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以加快资本的周转，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家在生产领域中采取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改进生产方法来缩短生产时间在流通领域中，则用发展运输业、邮电业和改进商业组织等办法来缩短流通时间。但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使得技术的改进往往受到阻碍，商品销售常常发生困难。因此，资本家加速资本周转的企图，并不是经常能够顺利地实现的。

资本主义再生产是自发地在对抗性矛盾中实现的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成千成万的资本主义企业，每一个企业的个别资本对其他资本来说，都是独立地发挥着资本的职能，实

现着价值的增殖。但是，这些独立的个别资本并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因为，各个个别资本必须通过流通过程同其他资本发生一定的联系，才能实现增殖价值的目的。例如纺纱企业，一方面要同向它供应纺纱机、棉花等生产资料的企业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又要同消费它的产品例如织布的企业发生联系，出售它的产品棉纱。因而，各个企业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相互依存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各个独立的个别资本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相互联系的个别资本的总和就是社会资本，个别资本运动的总和就形成了社会资本的总运动。

前面我们分析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是从个别资本再生产的角度讲的，主要是分析了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过程。至于资本家向哪里出售自己的商品，他又从哪里买到各种生产资料，资本家和工人又从哪里买到他们所需要的消费资料，还没有加以分析。但是，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情形就不同了。因为社会资本已经包括了所有的个别资本，它在再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物质资料，只能从社会总产品中得到补偿。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社会总产品能否以及如何实物形式上补偿当年消耗掉的各种物质资料，就成了社会再生产能否正常进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正如列宁所指出：“**现在的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因而这里不仅是价值的补偿，而且是产品实物形式的补偿**”。所以，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不仅要从价值的补偿，而且必须从实物形式的补偿上来加以考察。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产品，在价值上可分解为不变资本（ c ）、可变资本（ v ）和剩余价值（ m ），在实物形式上，则由它们在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区分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

同产品的实物形式的划分相适应，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 I ），即生产机器、设

备、原材料等产品 γ 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的生产（Ⅲ，即生产食品、衣服、日用品等产品。在每一部类内部，又包括许多生产部门。

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们假设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产周期是一年，而且不变资本的价值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一切商品都按价值出售，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不发生变动 γ 不存在对外贸易。这样，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将出现下列图式：

$$\text{I. }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text{II. } 2,000c + 500v + 500m = 3,000$$

这里假设第一部类的不变资本是 4,00，可变资本是 1,000，剩余价值是 1,000，全部产品的价值是 6,000 它的实物形式是生产资料；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是 2,00，可变资本是 500，剩余价值是 500，全部产品价值为 3,00，它的实物形式是消费资料。

为了使再生产能够继续进行，两大部类的产品都必须实现。什么叫产品的实现呢？就是说，已经消耗了的东西，不仅要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同时还要在实物形式上得到替换。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要卖得出去，又要买得进来。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两大部类的产品是如何实现的首先是第一部类内部的交换。第一部类在年初生产过程开始时，有价值 4,000 的生产资料，假设到年末生产过程结束时，已经全部消耗掉了。为了要使第二年的简单再生产得以进行，就需要有价值 4,000 的新的生产资料去补偿。那末，这些资本家从哪里去取得这些生产资料呢？只有从本部类内部相互交换各自的商品来取得，因为只有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例如，机器制造厂的资本家向钢铁厂的资本家购买钢铁，钢铁厂的资本家向炼焦厂的资本家购买焦炭，向机器制造厂的资本家购买机器……。这样，通过第一部类内部之间的交换，使 4,000c 在价值形式和实物形式上都得到了补偿和替换。正如马克思所说：“这

种交换就是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和另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的交流，就是一种生产资料和另一种生产资料的交流。”

其次是第二部类内部的交流。第二部类在年末生产过程结束时，工人领到 500 的工资要用于个人消费；资本家占有了 500 剩余价值，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没有资本积累，这 500 剩余价值也是用来购买消费资料的。那末，他们从哪里购得各自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呢？只有在第二部类内部，因为只有第二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通过第二部类内部相互交流的结果，使代表 500v 和 500m 的那部分产品，在价值形式上和实物形式上都得到了实现。

最后是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流。经过上述两种交流，第一部类中还剩下相当于 1,000v 和 1,000m 的产品，在第二部类则剩下相当于 2,000c 的产品，这两部分产品都不能在本部类内部实现。因为第一部类的 1,000v 和 1,000m，就它们的价值形式来说，是应该由工人和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但这部分产品却不是消费资料，而是生产资料；第二部类的 2,000 就它的价值形式来说，是应该由资本家用来补偿生产资料消耗的，但这部分产品却不是生产资料，而是消费资料。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只有通过两部类之间的交流来解决。交流的结果是：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各种消费资料，第二部类资本家也获得来年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流可以用图式表示如下：

$$I. 4,000c + \boxed{1,000v + 1,000m} = 6,000$$

$$II. \boxed{2,000c} + 500v + 500m = 3,000$$

整个交流过程的结果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即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同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在价值量上必须相等，也就是在我们上面所举的例子中的 I (1,000v+1,000m) 必须等于 II 2,000c。两部类之间只有保持这样的比例关系，资本主义简单再

生产才能继续进行。所以说， $I(v+m) = I$ ，是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社会产品实现的条件。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征是扩大再生产。要进行扩大再生产，资本家就不能把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必须不断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资本家要扩大生产规模，必须把追加资本的一部分作为不变资本，用来购买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机器、原料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作为可变资本，用来增雇工人。因此，要进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第一部类在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产品，除了补偿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当年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必须有剩余，否则扩大再生产就根本无法进行。这个条件，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I(c + v + m) > I c + II c。$$

这个公式两端都有一个 $I c$ ，表明第一部类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可以在第一部类内部得到补偿。把第一部类内部的补偿关系撤开，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关系来讲，上述的公式就表现为 $I(v+m) > II c$ ，这就是说，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应当大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这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下面我们试用图式进一步来分析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产品究竟是怎样实现的：

$$I.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II. 1,500c + 750v + 750m = 3,000$$

以上是第一年两大部类生产情况的数字假设，它是符合

$$I(c + v + m) > I c + II c \text{ 或 } I(v + m) > II c \text{ 这一前提}$$

条件的。现在，既然要进行扩大再生产，资本家就不能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都用于消费。假定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把 $1,000m$ 的一半作为个人消费，另一半转变为追加资本，并按照原来的资本有机

构成 4:1 的比例 (4,000:1,000) 追加到原有的资本中去。

这样, 1,000m 的分配就是:

$$1,000m \begin{cases} < 500 \text{ 资本家个人消费} \\ < 500 \text{ 用作积累} \end{cases} \begin{cases} < 400c \\ < 100v \end{cases}$$

我们知道, 第一部类追加的不变资本 400 是用来添置生产资料, 而它的实物形式也是生产资料, 所以, 可以在第一部类内部交换取得。可是, 第一部类追加的可变资本 100 是用来支付增雇工人的工资, 要用于工人个人消费, 可是它的实物形式却是生产资料, 所以, 它必须通过同第二部类交换, 从第二部类取得。

由于第一部类追加的可变资本 100 的实物形式是生产资料, 要同第二部类进行交换, 这既为第二部类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条件, 又要求第二部类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资本积累, 实行扩大再生产, 以适应两部类扩大再生产对消费资料的需要。假定第二部类的资本家用自己一部分剩余价值 (100m) 和第一部类换取生产资料, 变成追加的不变资本, 并按照第二部类原来资本有机构成 2:1 的比例 (1,500c: 750v), 再拿出 50m 作为追加的可变资本。这样 750m 就作如下分配:

$$750m \begin{cases} < 600 \text{ 资本家个人消费} \\ < 150 \text{ 用作积累} \end{cases} \begin{cases} < 100c \\ < 50v \end{cases}$$

经过以上资本积累, 两大部类产品在价值上重新组合为:

$$\text{I. } (4,000c + 400c) + (1,000v + 100v) + 500m = 6,000$$

$$\text{II. } (1,500c + 100c) + (750v + 50v) + 600m = 3,000$$

这样, 两大部类的资本就都比原来预付的资本增大了, 从而为保证两大部类下一年的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进行创造了条件。

那末,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 两大部类的产品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社会产品的实现和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一样，分三个方面来进行：第一部类内部的交换，第二部类内部的交换，以及在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用图式来表示如下：

$$I. (4,000c + 400c) + \boxed{(1,000v + 100v) + 500m} = 6,000$$

$$II. \boxed{(1,500c + 100c)} + (750v + 50v) + 600m = 3,000$$

经过上述的交换，两大部类的资本都比原来预付的资增大了，第二年开始时两大部类的资本构成如下：

$$I. 4,400c + 1,100v + 1,100m = 6,600$$

$$II. 1,600c + 800v + 800m = 3,200$$

同第一年的生产相比，已实现了扩大再生产。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了解了在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产品实现必须具备的条件。但是，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经常存在这些条件。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条件是经常遭到破坏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抽象的实现论假设而且应当假设，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产品是按比例分配的。但是，实现论这样假设决不是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总是按比例分配或者能够按比例分配**”。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和产品资本家私有制，整个社会生产受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所支配。这就使得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以及同一部类内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不能不经常遭到破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这样的对抗性矛盾，使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无法经常保持必要的比例关系。因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进行不能不遇到重重困难和障碍。

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充满着一系列对抗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为经济危机。

七、剥削和压迫工人的是整个资产阶级

——剩余价值的瓜分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仅受所在企业的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受由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等构成的整个资产阶级以及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什么产业利润、商业利润、银行利润、利息、地租等等，统统都是从工人身上刮取的，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那末，各个剥削集团是怎样瓜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是怎样转化为利润、利息、地租等不同的具体形式的呢？这是这一讲要回答的问题

产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利润率平均化

对剩余价值的贪得无厌，是资本家的本性。资本家剥削的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在现象上却表现为资本家获得利润。那末，利润和剩余价值究竟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我们知道，资本家为了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必须预付一笔资本。在这笔资本中，一部分用来购买生产资料，一部分用来购买劳动力，然后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前面第四讲已经讲过，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是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

改变它的价值量。而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是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会实现价值增殖，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价值本来是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只是可变资本的产物，但是，资本家在计算他的赢利程度时，总是把他获得的剩余价值，去同他预付的全部资本比较，似乎剩余价值是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这样，“**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也就转化为利润率。剩余

价值对可变资本之比就是剩余价值率，它的公式是：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可变资本}}$$

即 $\frac{m}{v}$ ；剩余价值对预付总资本之比就是利润率，它的公式是：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预付总资本}}, \text{ 即 } \frac{m}{c + v}。$$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以后，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好象不变资本也可以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似的；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之后，又大大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例如，一个资本家预付了 10,000 元的总资本，其中不变资本是 8,000 元，可变资本是 2,000 元，一年中剥削到的剩余价值是 2,000 元。剩余价值率是 2000/2000=100% 而利润率则是 2,000/(8,000+2,000) 即只有 20% 比剩余价值率低得多了所以，资本家把剩余价值当作是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以及对工人的剥削程度。

唯利是图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资本家总是企图以最小的预付资本，攫取最大的利润。为着追逐利润资本家不仅残酷地剥削工人，而且资本家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既有同一部门内部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又有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

在同一部门内部各企业之间的竞争中，那些采用新技术的资本家处于有利地位。他们的企业劳动生产率高，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这种超额剩余价值，转化为超额利润，落入采用新技术的资本家的腰包。至于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则产生另一种后果。它使各不同部门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形成一个平均利润率。各部门的资本家就按照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个原则，来瓜分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不同部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是怎样使利润率平均化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各个生产部门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它们的利润率也必然不一样。因为资本有机构成是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的比例，而剩余价值只是可变资本增殖的结果所以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如果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即不变资本的比重较大，可变资本的比重较小，那末，同样多的预付总资本就只能带来较少的剩余价值，利润率就必然要低些。

反之，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利润率就要高些。我们假定社会上有制鞋、纺织和机器制造三个部门。制鞋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是 7:3，纺织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是 8:2，机器制造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是 9:1。这三个部门资本都是 10,00（假定它的单位是千元、万元...，都是一样），剩余价值率都是 100%。

为了分析简便起见，我们还假定这三个部门资本的周转速度都是每年一次，不变资本也在一年中全部转移到该年的产品中去。这样，按 100%的剩余价值率，制鞋部门获得利润 3,000，纺织部门获得利润 2,000，而机器制造部门只获得利润 1,000 制鞋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最低，它的利润率是 30%。

机器制造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最高，它的利润率就低，只有 10%。纺织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处在中等水平，它的利润率是 20%，比制鞋部门低，却比机器制造部门高。

这种投资相同，利润不同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长

期存在的。因为资本家总要设法把资本投向利润率高的生产部门。所以，上述情况必然会发生变化。首先，机器制造部门的某些资本家不干了，而把资本投向利润率高的制鞋部门中去。这种资本转移的结果，使制鞋部门的生产大为增加，供应逐渐超过需求，价格逐渐下降；另一方面，机器制造部门的生产逐渐减少，机器设备的供应逐渐不能满足需要，价格就逐渐上涨。资本转移和价格涨落的结果，就会使各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大体趋于平均，形成一个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拿社会的全部剩余价值同社会总资本相比的结果。如拿上述三个部门代表全部社会生产，社会的全部剩余价值就是 6,000 会总资本是 30,000 均利润率就是 $30,00=20\%$ 。

按照平均利润率取得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马克思指出：“**平均利润只能是按照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的比例分配在这些资本量上的剩余价值总量**”。平均利润这一范畴反映了各部门资本家共同瓜分全社会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关系。

平均利润的形成，进一步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因为原来在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具体形式以后，剩余价值的来源已经被弄得模糊不清了，但那时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量，仍同该部门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相等；而在平均利润形成以后，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共同瓜分剩余价值，以致各部门所获得的利润量也同它们各自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不一致了。这时，各部门只要拥有等量的资本，就能获得等量利润，利润的大小，完全取决于预付总资本的大小，这就把利润的本质和它所反映的剥削关系进一步掩盖起来了。

平均利润形成以后，各个资本家实际上不再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而是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卖商平均利润形成以后，各个资本家实际上不再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而是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卖商品了。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根据前面的假定，生产价格的形成过程可用下表来说明：

生产 部门	不变 资本 (1)	可变 资本 (2)	剩余 价值 (3)	商品 价值 (4) = (1) + (2) + (3)	平均 利润 率(%) (5)	平 均 利 润 (6) = [(1) + (2)] × (5)	商品生 产价格 (7) = (1) + (2) + (6)	生产价格 和价值的 差 额 (8) = (7) - (4)
制鞋	7,000	3,000	3,000	13,000	20	2,000	12,000	-1,000
纺织	8,000	2,000	2,000	12,000	20	2,000	12,000	0
机器 制造	9,000	1,000	1,000	11,000	20	2,000	12,000	+1,000
合计	24,000	6,000	6,000	36,000	20	6,000	36,000	0

从上表可以看出：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机器制造部门，商品的生产价格高于商品的价值；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制鞋部门，生产价格低于价值；只有资本有机构成中等的纺织部门，它的生产价格才和价值一致。

随着平均利润的形成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就不再围绕价值，而是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了。生产价格的出现，是否表明价值规律就不再发生作用呢？不是。因为从个别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来看，有的按高于商品价值的生产价格出卖商品，获得的利润多于该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有的按低于商品价值的生产价格出卖商品，获得的利润少于该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从全社会来看，商品价值的总额和生产价格总额仍是相等的，全体产业资本家获得的平均利润的总额，同全体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也是相等的。所以，生产价格只是价值的转化形式。

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的理论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仅受到本企业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受到全体产业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

商业资本家通过商品买卖瓜分剩余价值

我们在以上的分析中，假定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被产业资本家独吞了的。实际上，产业资本家并不能独吞，他必须把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让给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不从事商品生产，而是预付资本，从产业资本家那里成批买进商品，再销售出去，帮助产业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并从中瓜分到一部分剩余价值。商业资本家瓜分到的这一部分剩余价值，叫做商业利润。

为什么产业资本家需要有商业资本家来为它推销商品，愿意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转让一部分给商业资本家呢？这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业资本家生产的商品越来越多，商品的销售市场越来越扩大，如果由产业资本家自己来经营商品出卖业务，就必须建立庞大的商业机构，雇用大量的店员。这对产业资本家来说是不利的，会使大量的资本停留在流通过程，影响他的生产规模和竞争能力。把出卖商品的事，交给专门从事买卖的商业资本家去担负，一方面，可以获得由于商品买卖专业化所带来的好处，有利于节约流通费用；另一方面，因为有了商业资本的独立活动，产业资本家把商品成批地卖给商业资本家，就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转化，使他的资本可以更多地生产领域活动，更多地作为生产资本来发挥作用，以便剥削到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样，虽然要转让一部分剩余价值给商业资本家，但总算起来，对产业资本家还是合算的。这就是商业资本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原因。

商业资本家投资于商业，帮产业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它不仅要求获得商业利润，而且要求这种商业利润不低于产业资本的平均利润。否则，商业资本家就宁肯把资本投到生产部门中去，而不愿意经营商业了商业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从表面上看来，商业利润好象是由于在价值以上出卖商品带来的。资产阶级正是

抓住了这点假象，胡说商业利润是在流通中产生的。这是对商业利润来源的歪曲，对剥削的掩盖。

其实，商业利润也是产业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为产业资本家要商业资本家为它推销商品，它的商品就不能按生产价格出卖而必须按照低于商品生产价格的价格卖给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消费者。这样，产业资本家就把从工人身上榨取到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分割给商业资本家了。

例如，我们假设社会上的产业资本家一年中投资 400 亿元，其中不变资本 300 亿元，可变资本 100 亿元，剩余价值 100 亿元。同时假定生产周期为一年，不变资本的价值也在一年内全部转移到产品上去，这时商品的总价值或总生产价格就是 300 亿元+100 亿元+100 亿元=500 亿元，利润率则是 400/25%。但是，商品流通还要经过商业资本家来插手，假设商业资本总额是 100 亿元。这样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发挥职能的总资本一共是 500 亿元，100 亿元剩余价值，必须在这 500 亿元的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中平均分摊，平均利润率就不能是 25%，而只能是 20%。产业资本家按 20% 的平均利润率，获得平均利润 80 亿元；商业资本家按 20% 的平均利润率，获得平均利润 20 亿元。商业资本家能够得到这 20 亿元的利润，就是产业资本家按照低于商品生产价格的价格，即按 480 亿元（成本 400 亿元加产业利润 80 亿元）的价格，把商品卖给了商业资本家；而商业资本家则按 500 亿元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从中获得了 20 亿元利润。这样，工人创造的 100 亿元剩余价值，就由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按照各自预付资本的比例，共同瓜分了。商业店员和产业工人一样，都是工资雇佣劳动者，都是受资产阶级剥削的。商业店员和产业工人不同之处是：产业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在生产领域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商业店员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在流通领域为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为什么说商业店员仍和产业工人一样是受剥削的呢？这是因为，商业

店员和产业工人都是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他们劳动力的价值同样要由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商业店员单纯从事商品买卖的劳动虽然不创造价值 and 剩余价值，但是，商品价值和其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却要由他们的劳动来实现。因此，店员的劳动时间，同样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店员销售商品所实现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被用来补偿商业资本家购买店员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店员无偿地为商业资本家劳动，使商业资本家可以由于店员的劳动而从产业资本家那里瓜分到一部分剩余价值，形成商业利润。所以，商业店员和产业工人一样，都是被剥削者。

商业资本家对店员的剥削同样是很残酷的。商业资本家为了提取更多的商业利润，用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和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克扣店员工资等等毒辣手段，来加强对店员的剥削。如旧上海协大祥绸布店的资本家，为了加强对店员的剥削，订出了一百二十条店规。每天要店员营业十六到十七小时，劳动强度很高，而工资却被资本家七折八扣，扣得连最起码的生活也不能维持。在资本家的血腥榨取下，广大店员同千千万万产业工人一样，不只是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简直是在出卖自己的生命。

借贷资本家通过货币贷放瓜分剩余价值

在资本主义社会，参与剩余价值瓜分的，除了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等职能资本家以外，还有借贷资本家。

资本借贷关系的存在，有它的客观必然性。因为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有时会感到资本不足，例如，在制成品还未售出而又需要购买机器、原料和支付工资时，就需要借入一些货币资本；有时又会出现暂时闲置的货币资本，例如，在固定资本更新以前资本家手里就会有一笔以货币形式的折旧基金逐步积累起来；在销售商品有了收入，未购进原料和支付工资的一段时

间里，也会有相当数量的货币资本闲置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就可以把暂时闲置不用的货币资本转让给需要货币的资本家使用。借入货币资本的资本家就利用这笔货币资本，从事商品生产或商品销售活动，榨取或实现剩余价值。当然，货币资本的拥有者不会白白地把货币资本借给人用，他必然要求借入货币资本的资本家拿出一定数量的货币，作为使用这笔贷款的报酬。借入货币资本的资本家必须将剥削到的剩余价值，分一部分给贷出货币资本的资本家，这一部分剩余价值就叫做利息。

为了获取利息而贷放出去的货币资本，就是借贷资本。利息量同借贷资本的比率，就叫做利息率，或简称利率。利率的最高水平不能超过平均利润率。如果不是这样，借入货币的资本家就得不到任何好处，也就不愿借款了。利息的来源是剩余价值但是，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却炮制了“大钱生小钱”的谬论，胡说“利息是货币本身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利息的实质和来源，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的借贷，很大部分要通过银行的中介。银行通过吸收存款，把社会上的闲置货币资本和居民手中暂时不用的货币收集起来；通过贷款把货币借给职能资本家使用。银行吸收存款要支付利息，贷款出去要收取利息。贷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借贷利息之差，扣除银行的经营费用以后，就构成为银行利润。同利息的来源一样，银行利润也是工人在生产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银行资本家通过借贷获取利息差额，参与了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瓜分。

银行资本家预付资本、经营银行的目的，是为了攫取利润。因此，银行利润也不能低于职能资本家所获得的平均利润。如果银行利润低于平均利润，他就不肯开办银行，而要去办工厂、开商店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企业规模日益扩大。举办大企业所需要的大量资本，一般不是单个资本家所能担当得起的，于是

产生了把许多个别资本家聚集起来成立股份公司的需要。股份公司是一种合资经营的企业。它是大资本控制中小资本，促进资本集中的重要手段。

股份公司发行股票，货币所有者购买股票成为股东。持股票的股东有权根据股票数量从企业的赢利中分得一份收入。凭股票获得的收入称为股息。

购买股票的资本家，可以不管任何事情，整天游荡而光凭股息过着奢侈的生活。股票所有者还用股票进行投机买卖在股票交易所中，充满着尔虞我诈的竞争。靠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的出现和股票的投机，是资本主义寄生性增强的反映。

土地所有者坐地分赃

土地所有者，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又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占有土地，把土地租给工业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收取地租，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地租的实质，我们先从资本主义地租有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两种形式谈起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但是，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同，它的数量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土地中，肥沃程度又各不相同，有优等地、中等地和劣等地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土地的限制性，就产生了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垄断在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垄断的情况下，有些农业资本家经营优等地和中等地，有些农业资本家要经营劣等地。因为仅仅经营优等地和中等地，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还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以致农产品必然由于供不应求而引起价格上涨。

直涨到经营劣等地的农业资本家也能得到平均利润为止。马克思指出：“**最坏土地的生产价格，总是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这样，经营优等地和中等地的农业资本家就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就形成了级差地租。

级差地租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和土地位置的不同而产生的，称为级差地租 I；另一种是由于对同一块土地连续增加投资而产生的，称为级差地租 II。

我们先以种植某种农产品的面积相同而肥沃程度不同的三块土地为例，来说明级差地租 I 的产生。

单位：元

土地 种类	投入 资本 (1)	平均 利润 (2)	产量 (斤) (3)	个别生产价格		社会生产价格		级差 地租 I (8)
				全部产品 (4) = (1) + (2)	单位产品 (5) = (4) ÷ (3)	单位产品 (6)	全部产品 (7) = (6) × (3)	
劣等地	200	40	4,000	240	0.060	0.060	240	0
中等地	200	40	5,000	240	0.048	0.060	300	60
优等地	200	40	6,000	240	0.040	0.060	360	120

这三块土地的投资都是 200 元，假定资本全部转移到农产品中去，成本价格就都是 200 元。但是，在肥沃程度不同的土地上，农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农产品产量分别为 4,000 斤，5,000 斤和 6,000 斤。如果平均利润率为 20%，那末，每块土地的全部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平均利润）都将等于 240 元。但是，由于每块土地的农产品的产量不同，因此，单位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是不同的，在劣等地上是每斤 0.060 元，中等地上是 0.048 元，优等地上是 0.040 元。市场上的社会生产价格则是由劣等地的个别生产价格（即每斤 0.060 元）决定的。这样，经营劣等地的农业资本家获得 240 元，扣除 200 元成本价格，获得 40 元平均利润，没有超额利润，没有级差地租。而经营中等地和优等地的农业资本家，则分别获得 300 元和 360 元，扣除了 200 元成本价格，各获得 40 元平均利润以外，还分别得到 60 元和 120 元的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就形成了级差地租 I 我们再以种植某种农产品而对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为例，来说明级差地租 II 的产生。例如，经营劣等地的农业资本家在土地上连续投资，第一次投资 200 元，

农产品的产量为 4,000 斤，平均利润为 40 元，没有超额利润，没有级差地租。

如果这个资本家第二次追加投资 200 元，用来造水利，加肥料，采用新机器，多雇用农业工人，并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就可多得到 5,000 斤农产品（即共投资 400 元，收获 9,000 斤）。

在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第二次投资多获得的这 5,000 斤农产品的总价格是 300 元，扣除 200 元成本价格和 40 元平均利润后，还有超额利润 60 元，这 60 元就是级差地租 II。

在这里必须指出，地租的数量是在农业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订立租地契约时已确定的。所以，在租约期间内，由于连续投资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便由农业资本家占有。但是，在租约期满重新订契约时，土地所有者又要提高地租。结果，这部分超额利润就以级差地租 II 的形态，让给土地所有者占有。马克思指出：“**级差地租有这样一个特点：土地所有权在这里仅仅取去超额利润，否则这种超额利润就会被租地农场主据为己有，而在一定情况下，在租约未满期间，实际上也是被租地农场主据为己有。**”因此，农业资本家总是力图签订长期租约，而土地所有者则竭力要把租约期缩短，双方都为获取这部分超额利润而争夺。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这种矛盾，使得农业资本家在租约将要满期前夕拚命掠夺土地的肥力。

劣等地不提供级差地租，但是，劣等土地的所有者如果得不到任何地租，他就宁可让土地荒芜，也决不肯白白地给别人使用。事实上，经营劣等地的农业资本家，也必须向土地所有者缴纳地租。这种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而形成的地租叫做绝对地租。

既然经营劣等地的农业资本家也必须获得平均利润，那末绝对地租从何而来呢？

在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的技术总是落后于工业，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总是比工业要低些。我们知道，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带来的。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工业低，等量的农业资本就能比

等量的工业资本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假定工业中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是 8:2，剩余价值率是 100% 那末，每 100 元的资本中可变资本是 20 元，带来的剩余价值也是 20 元，平均利润率是 20%，商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都是 120 元。

又假设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是 6:4，剩余价值率也是 100% 那末，每 100 元中的可变资本是 40 元，带来的剩余价值也是 40 元，农产品的价值是 140 元，利润率为 40%。在资本主义社会，农产品是可以按照价值（即 140 元）出售的。但是，农业资本家只能得到和产业资本家相等的平均利润，即 20 元，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是 120 元。现在，农产品按照高于生产价格的价值出卖，农业资本家除了可以获得 20 元的平均利润以外，还有 20 元的余额，这个农产品价值高于生产价格的余额，就形成了绝对地租。

为什么农产品可以按照高于生产价格的价值出卖呢？这是由于存在着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在工业中，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也是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低的生产部门必然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由于部门之间的竞争和资本的转移，结果使所有的产业资本家只能得到平均利润，工业品只能按照生产价格出卖。但是，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不同，农业中有一只拦路虎，即土地私有权的垄断，使资本不能无条件地转移到农业中来。这就阻碍了农业部门中的剩余价值参加利润平均化的过程，农产品就可以按照高于生产价格的价值出卖因此，在农业中，即使在劣等土地上，等量资本也可以比工业中获得较多的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并不分给工业，而留在农业中，转化为绝对地租，付给土地所有者。

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形成的原因虽然不同，但是，它的实质和来源却是相同的。土地作为资本主义经营垄断的结果，农产品价格由劣等地上的生产价格决定，经营优等地和中等地的农业资本家就获得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和土地私有权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即使没有土地私有权，经营优等地和中等地的农业资本家，

也是可以获得这部分超额利润的。马克思指出：土地私有权“不是使这个超额利润创造出来的原因，而是使它转化为地租形式的原因”。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存在，这种超额利润就转化为级差地租了。并且还因为土地私有权的垄断的存在，农产品的价格能按高于生产价格的价值出卖，使经营劣等土地的农业资本家也能获得超额利润，并转化为绝对地租，付给土地所有者。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来源，都是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同农业中的全部剩余价值一样，是由农业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农业资本家向土地所有者租入土地，购买生产资料，雇用农业工人进行生产，榨取农业工人的剩余价值。在这个剩余价值中，农业资本家获得平均利润，平均利润以上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则转化为地租。

因此，地租的实质也是剩余价值但是，土地所有者及其代理人为了掩盖土地所有者伙同农业资本家剥削农业工人的关系，抓住好地和坏地的农产品产量不同的表面现象，硬说“地租是土地本身带来的”。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好的土地和较好的土地只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只是给农业中创造超额利润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农业工人的劳动最好的土地也决不会创造出任何价值来。马克思指出：“**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产物。**”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彻底戳穿了土地所有者及其代言人的谬论。

资本主义地租和封建地租都是土地私有制的产物，但是，它们所体现的剥削关系是不同的。封建地租是封建地主从农民那里剥削到的全部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而资本主义地租是农业资本家从农业工人那里榨取到的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封建地租体现着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而资本主义地租则体现着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共同剥削农业工人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是分为不同的剥削集团的，有工业资本家农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等等。土地所有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个剥削阶级。他们都

是一丘之貉，共同瓜分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共同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骑在工人阶级头上的，是整个资产阶级。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是整个工人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工人阶级要翻身解放，就必须作为一个阶级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进行革命，打倒整个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八、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

——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分配和再生产中的各种矛盾激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又造成了什么后果？在这一讲，我们就将阐述这些问题。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

在资本主义以前，例如，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生活方面也曾多次出现某种危机。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以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劳动人民流离失所，成千成万地死于饥饿和瘟疫。那个时候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危机，是以生产不足，特别是粮食生产不足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不是生产不足，而是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最突出的现象是：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工厂关门、银行倒闭、股票跌价、失业人数激增，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经济陷于瘫痪和混乱状态。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所谓“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过剩，不是说社会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广大群众已消费不了。在危机爆发时，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纺

织工人接了解雇通知，说是纱布生产过剩，没有销路，所以要缩减生产、解雇工人。但是，纺织工人一家人却是衣单被薄，生产布的人却买不起布。煤矿工人接了解雇通知，说是煤炭生产过剩，需要解雇减产。但是，煤炭工人一家人却正在寒风中战栗，无钱买煤御寒。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剩，是相对的过剩，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只是在同人民群众的购买力相比较的时候，才显得太多了。在危机时期，一方面，是资本家的仓库里商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眼看着某些商品白白地烂掉，甚至人为地大批毁坏掉；另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贫困，买不起东西，缺吃少穿，挣扎在饥饿线上。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现象，但是，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却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早就潜伏着了。商品生产者卖掉自己的商品得到货币以后，并不一定马上就拿货币去购买生产资料或其他需要的生活用品。而如果不买进，那些作为他的交换对手的商品生产者，也就不能卖出。这里就有可能发生买和卖的脱节，就已经存在着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当商品生产还是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的时候，生产目的是为了换取其他的商品来维持自己的消费需要，所以，卖后不买进的情况一般是不多的；同时，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生产规模狭小，社会分工还不很发达，生产联系还不紧密，所以，买和卖的脱节虽然可能发生，但它的影响也只是局部的，不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经济危机。所以，尽管商品经济本身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危机的必然性却只能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中去寻找。

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发生经济危机，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斯大林指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什么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呢？

这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表现为生产能力的

巨大增长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同手工业者的个体生产大不相同。个体生产是以简单再生产为特征的。即使在市场条件十分有利的状况下，它的生产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资本主义生产是大机器生产，具有迅速增长的可能性。而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无不力图扩大生产，因为生产规模越大，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同时，资本家为了要在竞争中使自己能站住脚，不被别的资本家挤垮，也不得不努力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随着生产的增长，要求消费水平相应地提高，才能使增加的商品卖得掉，社会生产才能继续进行。但是，在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的情况下，资本家总是力图把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限度。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新技术的采用，又必然要把大批工人赶出厂门，扩大失业者的队伍。资本主义的竞争，则必然使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使中小资本也被大资本排挤和并吞。所有这些，都必然使市场的扩大赶不上生产的增长。这样，一方面是生产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是劳动人民购买力的相对缩小，正是这种生产巨大增长的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还因为这一矛盾必然要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使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更加密切了。例如：纺织厂所需要的棉花是由农业部门供应的，纺织机是由机械制造业供应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生产究竟需要多少棉花，需要多少布匹，需要多少纺织机，要求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和安排，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可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却使整个社会割裂为千千万万个各自为政的资本主义企业从一个企业来看，这个企业的工人都听命于同一个资本，企业内部的生产是有组织的。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不同资本家的各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却

是各个资本家的私事，谁都管不了谁。所以，整个社会生产是在无政府状态中进行的。由于整个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各个资本家不可能了解社会对某种商品的真实需求情况。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家就要相互竞争，拚命扩大生产。同时，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也会造成虚假的需求，掩盖社会真实的购买力情况。尽管生产实际上已经超越群众购买力的水平，但是，只要市场上价格的上涨势头还没有落下来，商业资本家还会盲目地向产业资本家订货，借贷资本家也会拚命向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护大信贷，助长产业资本家盲目地扩大生产，造成市场上的虚假繁荣。这种虚假繁荣，掩盖了实际存在和发展着的生产过剩，以致当生产过剩终于掩盖不住而暴露出来的时候，它就要象雪崩一样地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可见，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这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要爆发经济危机。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费尽心机地捏造出种种谎言，妄图把危机说成是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的事，以此来欺骗劳动人民，为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效劳。例如，他们有的把危机的根源，说成是“消费不足并据此提出可以用“刺激消费”的办法来消灭危机。其实，劳动人民消费不足不是资本主义出现后才有的，它是自人类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后就有了，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却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的。可见，经济危机决不能用“消费不足”来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民经济军事化造成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时虚假繁荣，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就好像找到了救命的稻草一样，胡说什么：“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在陷入巨大的经济危机里……这些见解都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

越多地参与国民经济的活动，因而就出现了所谓“自动调节器”，这些调节器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能“自动地趋于稳定”了。这也是欺人之谈。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国家搞国民经济军事化也好，调节经济生活也好，无非是通过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使资本家发财致富。列宁早就指出过：“**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是给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起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办法就是把工人‘勒紧’，紧到挨饿的地步，另一方面保证（用秘密手段、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资产阶级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不仅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自动地趋于稳定”，相反，却在资产阶级获得惊人利润的同时，使劳动人民更加贫困，市场更趋缩小，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趋严重。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着愈益严重的趋势

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要发生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不是爆发一次、二次的问题，而必然要经常周期性地重现。从历史上看，第一次大规模的经危机，是一八二五年首先在英国发生的。此后，一八三六年八四七年、一八五七年、一八六七年又一再地出现经济危机，平均是十年左右发生一次。以后不仅仍不断地爆发，而且日趋严重。

经济危机的周期，就是从上次危机到下次危机之间的时期。它一般由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所组成。其中危机是周期的基本阶段，它是上一次周期的终点，同时又是新周期的起点。

危机阶段：危机往往是突然到来的。危机到来之前，市场上存在着一片虚假繁荣，工商各业都是“生意兴隆”。虽然生产早已超

过了实际的需要，但是，由于信用制度和投机活动非常活跃，工厂还是开足马力在为仓库和定单而生产。突然间，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上某一环节的脱节，经济危机到来了。一旦某一部门的生产过剩暴露出来，商品销售发生困难便会很快地影响到其他部门，并发生连锁反应。例如，汽车制造业生产过剩，减产停产，必然影响到钢铁工业、橡胶工业；而钢铁工业的减产停产，又必然影响到煤炭工业、电力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商业上的投机活动者，曾经一度推波助澜，助长虚假繁荣，现在转过来抛出他们手中的存货，不惜削价出售，加剧了形势的恶化。这时仓库里存货增加，销售困难，物价猛跌。资本家为了阻止物价下跌，甚至人为地毁灭大量的商品。在商品没有销路和价格惨跌的打击下，许多中小企业首先大量破产，不少银行也纷纷关门。没有倒闭的工厂，也缩小生产规模。这时，社会上失业工人和其他各行各业失业者的人数激增，整个经济状况急剧恶化。

萧条阶段：经过危机时期急风暴雨的袭击以后，工商企业倒闭的浪潮终于平息下来了。经过危机后还能维持下来的企业，生产和流通都在缩小了规模的情况下进行。尽管商店门前张灯结彩，大吹大擂，生意还是很清淡。大量工人依然失业，生活无着。资本主义的工业、商业、银行业都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但是，在这个阶段，社会的消费毕竟还在进行着，积压如山的商品，经过很大的破坏以后，毕竟以很低的价格，缓慢地销售出去了。在停滞的表面下，促使生产恢复的因素正在逐步积累起来复苏阶段：随着存货的减少，商品价格逐步回升，利润逐步增加。资本家一方面加紧剥削工人，一方面改进技术，添置新设备，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以求在剧烈的竞争中取得胜利。这样，电力、钢铁、机械设备等第一部类的生产首先逐步扩大，这个部门的就业人数逐步增加，而就业人数的增加又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刺激第二部类生产的发展。这样，生产逐步恢复，失业人口逐步减少，原来处于极为萧条的资本主义经济，又逐步走向复苏高涨阶段：这

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市场商品畅销，利润激增，生产和流通的运动日益加速，信用和投机活动又开始活跃，市场上一片“景气”。资本家都拚命扩大生产。这样，在片“繁荣”的气象后面，新的危机的因素又日益积累起来了。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活跃形象地描述说：“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

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体现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同时也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它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是不停顿地向前发展的，它只能伴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迂回曲折地进行的。

战后日本经济危机

危机次数与年份	工 矿 业 生 产				全失业最高纪录		企业倒闭最高纪录	
	危机前 最高点	危机期 最低点	下降 幅度 (%)	下降 期数	失业 人数 (万人)	失业 增长 幅度 (%)	倒闭 家数	倒闭 增长 幅度 (%)
1 (1951.1—1951.10)	1951年6月	1951年8月	4.6	2	47	38.2	—	—
2 (1954.1—1954.11)	1954年1月	1954年8月	1.9	7	71	82.0	—	—
3 (1957.6—1958.6)	1957年7月	1958年6月	10.0	11	92	76.9	203	54.9
4 (1961.12—1962.10)	1962年3月	1962年10月	3.6	7	62	72.2	172	186.6
5 (1964.10—1965.10)	1964年12月	1965年5月	3.1	5	54	100.0	611	64.2
6 (1970.7—1971.12)	1970年7月	1971年5月	4.2	10	80	60.0	964	64.8

战后美国经济危机

危机次数与年份	工业生产				全失业最高纪录		企业倒闭	
	危机前最高点	危机最低点	下降幅度(%)	下降期月数	失业人数(万人)	失业率(%)	倒闭家数总计	最高月份倒家数
1 (1948—1949)	1948年10月	1949年10月	10.5	12	470	7.6	8,632	884
2 (1953—1954)	1953年7月	1954年8月	10.2	13	370	5.8	11,400	1,102
3 (1957—1958)	1957年2月	1958年4月	13.7	14	554	7.7	16,915	1,495
4 (1960—1961)	1960年1月	1961年2月	7.7	13	571	8.1	17,117	1,449
5 (1969—1970)	1969年9月	1970年11月	8.1	14	549	6.5	12,201	1,042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危机反复地出现。但是，每一次危机都不是前一次危机的简单的重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有愈益严重的趋势。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危机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危机的周期缩短，危机更加频繁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经济危机大约每隔十年左右发生一次，而在战后的二十几年中，危机的周期显著地缩短了从以下两表可以看出，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七二年，美国发生过五次经济危机，日本发生过六次经济危机。美国平均不到五年就要发生一次危机，日本平均不到四年就要发生一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危机周期明显地缩短，是因为在垄断资本的统治下，劳动人民受到愈来愈严重的剥削，购买力相对缩小，国内市场问题更加严重还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和扩张，加剧了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外市场日益缩小，商品销售经常发生困难这样就使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这一切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第二，固定资本盲目更新，使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比例关系更加失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都是固定资本投资急剧下降。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固定资本投资额一般都比战前有相当大的增加，即使在危机时期，投资水平还是比较高。战后美国第五次经济危机时期，固定资本投资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了增加，一九七〇年就比一九六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三点五。日本在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期间的一九七一年比一九七〇年固定资本投资额增长了百分之三点二。

战后危机期间固定资本投资水平较高，一方面表明了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把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加速资本积累，同时也加速了无产阶级贫困化，进一步削弱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另一方面，还表明了战后美国固定资本的投资，主要是由军事订货以及同扩军备战有关的需要构成的，这样，不仅大量浪费了社会资源，而且造成第一部类的盲目扩大，使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更加失调。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因此，它又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频繁，日益严重。

第三，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整个经济危机更加深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不仅在工业方面发生，而且也在农业方面发生。农业危机爆发时，表现为农业资本家仓库里的农产品储存量迅速增加，批发价格下跌，耕地面积缩小，农业工人失业增多，在业工人工资下降，大批个体农民破产。可见，农业危机同工业危机一样，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都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农业生产过剩的危机就同工业生产过剩的危机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同工业危机相比，农业危机一般持续时间比较长。美国自从在一九四八年爆发工业危机的同时爆发了农业危机以来，

在长达二十三年的时间中，农业始终不能摆脱生产过剩的危机。

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成为战后美国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工业危机使大批企业倒闭，工厂开工不足，工人失业，工资下降，结果造成对农产品需求的减少，促使农业生产过剩的危机加深。同时，农业危机也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农业劳动者贫困破产，这样也减少了对农业生产资料和其他工业品的需求，使工业生产过剩的危机更加深化。在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相互影响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将愈陷愈深。

第四，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同财政金融危机相互交织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更加缩短的同时，财政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频繁，而且往往出现经济危机同财政金融危机的“并发症”。财政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一样，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必然结果。它的主要表现是：财政收入不敷支出，滥发钞票，物价上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黄金储备枯竭，货币被迫贬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摆脱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妄图用扩军备战的办法，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打吗啡针。但是，这样一来，军费开支和军事工业生产的费用却越来越多，财政收支连年出现巨额赤字。为弥补庞大的军事费用，帝国主义国家拚命增加税收、举借外债、发行纸币，实行通货膨胀，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七一年财政年度，美国财政收入不敷出，赤字累计已达一千三百七十九亿美元，国债累计达四千二百四十一亿美元。连美国官方人士也惊呼美国“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债务总额还要大”，“如果把这些国债换成一美元的纸币，它可以连成三十五英尺宽的带子，环绕赤道一千五百二十圈”。

通货膨胀日益恶化，货币就越来越不值钱，造成物价不断上涨。以往经济危机爆发时，物价一般总是下跌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蓄意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和通货膨胀政策，造成危机期间物价不仅不下跌，反而猛烈上涨。例如，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爆发的五次经济危机中，除了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一次以外，其他四次物价都是上涨的。这表明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了。货币在国内的贬值，必然要影响到货币的对外信用；美帝国主义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海外驻军和作战费用大大增加，造成美元大量外流，更使美元在国际上的信用一落千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市场上，不断爆发金融危机，经常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迫使美国政府在一九七一年底和一九七三年二月两次宣布美元贬值，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地位土崩瓦解了。

经济危机同财政金融危机的“并发症”，使帝国主义经济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一方面，经济危机造成的生产大幅度下降和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收入，从而出现大量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促使财政金融危机更加严重；另一方面，随着财政金融危机的加深，通货膨胀，捐税增加，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又必然进一步促使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是一种恶性循环，它愈演愈烈，愈陷愈深，促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进步激化。重重危机就象狂风暴雨般地震撼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危机动摇着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

经济危机促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加剧。在危机期间，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许多中小企业竞争不过大企业，首先遭到破产的命运。为了偿还债务，许多中小企业被迫低价拍卖。少数大企业竞争能力强，就乘机低价收买，予以并吞。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每经过一次危机，资本就更加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使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更加加速。生产和资本的加速集中，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

的矛盾更加尖锐化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资本家为了减少自己在危机中所遭受的损失，总是要在劳动人民身上开刀。他们大批解雇工人，降低在业工人的工资，实行通货膨胀，增收苛捐杂税，千方百计地把危机的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同时，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工业对农业、城市对乡村的剥削也更加沉重，造成大量农民破产。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促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同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促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浪潮越来越高涨，从而不断动摇着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

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对于庞大的社会化的生产力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太狭隘了。它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危机期间，必须在生产力大大破坏，生产猛烈缩减以后，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才能得到暂时的、强制的解决。但在同时，导向一次新的危机的因素又在逐步积累起来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危机有愈益严重化的倾向，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腐朽了，它必然要被另一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

九、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处在自由竞争的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自由竞争逐步向垄断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完成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过渡，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曾对帝国主义下了一个确切完备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种特殊性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讲将首先阐述帝国主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有五个基本特征，即：“（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认识帝国主义反动本质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

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

经济上最突出的现象。帝国主义的其他特征都是同垄断相联系的，又是在垄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帝国主义通常又叫做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阶段。

第一阶段，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已发展到顶点。在工业中，发明了电动机、内燃机和新的炼钢法。生产力的发展，使轻重工业的比重开始发生变化，重工业开始占据优势。随着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重工业的日益发展，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开始出现了垄断组织的萌芽。

第二阶段，在一八七三年爆发的十九世纪最深刻的经济危机之后，企业之间的竞争大大加剧了。不少中小企业在竞争中纷纷倒闭，垄断组织有了广泛的发展。在美国，一八七九年，洛克菲勒创建了第一个大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八八〇年，美国全部无烟煤产量已被七个公司所垄断。但是，这时垄断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垄断协定大多带有短期的性质还不稳固。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中，蒸汽涡轮汽车、内燃机车等相继发明，生产力获得了高度的发展，重工业的比重进一步增加，过渡到垄断阶段的条件基本上成熟了。

第三阶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大大加快了，越来越多的资本集中到大企业的手中，垄断组织迅速发展，很快地控制了各种主要工业部门，垄断组织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二十世纪初，美国垄断组织控制了百分之七十的金属加工工业，百分之六十六的钢铁工业，百分之八十一的化学工业，百分之八十五的铝的生产，百分之九十五的煤炭和石油生产。从这个时期开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所以，列宁说：“**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

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它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

所有制。它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等经济规律依然发生作用。毛主席在《矛盾论》一书中曾经指出：“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在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某些新的特点，使资本主义原有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扩大了。

垄断组织是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或资本主义企业的联合。它们掌握着某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凭借其垄断地位规定垄断价格，榨取垄断高额利润，控制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命脉。

垄断组织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各企业相互勾结规定统一的垄断价格的“短期价格协定”；有各企业独立进行生产和销售，但在瓜分市场、规定生产数额和价格等方面统一经营的“卡特尔”；有各企业独立进行生产，但在收购原料和出售产品等方面统一办理的“辛迪加”；有把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完全合并起来的“托拉斯”；还有把许多不同种企业（工矿企业、贸易公司、运输公司、银行等）联合组成的“康采恩”。各种形式的套断组织的发展，还步控制了所有的经济部门，掌握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命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表现在：

（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垄断程度更加提高。以美国为例，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大公司，在一九〇一年只有一家，到九六〇年增加到九十六家，到一九七〇年又增加到二百八十二家。

（二）工业各部门日益为少数垄断资本控制。在许多工业部门，几家大公司就掌握了绝大部分以至全部的生产。在美国，一九六九年三大汽车公司垄断了全国汽车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八点一；在英国，一九七〇年一家钢铁公司垄断了英国钢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三；在日本，一九七〇年七大垄断组织控制了全国船舶生产总吨位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五；在法国，一九六八年一家电力公司控制了全

国的电力生产。

（三）农业生产集中和垄断程度加剧。一九三九年，美国农场总数为六百零九万七千个，一九五九年减少到三百七十万一千个，一九七一年只剩下二百八十万个，平均每年有九万个农场破产。实际上，美国农业生产现在是由不到五万个，即占农场总数百分之二的最大垄断农场所控制的，它们出售的农产品占美国全部农产品销售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四）垄断组织日益向综合多样化发展。不少公司过去以生产一两种产品为主但是，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它们的经营范围已迅速扩展到许多部门。例如，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在已往四十年的历史中，它以制造电讯器材为主要业务。但是近十年来，它却收买了五十家同电讯器材无关的公司，经营范围扩展到面包、人造纤维、建筑、旅馆、保险等企业，在世界各地控制着一百五十家公司，销售网遍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尽管有所不同，而且会发展变化，但是，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对生产和市场的垄断，保证垄断资本家获得垄断高额利润。

垄断高额利润是垄断资本家凭借其垄断地位而取得的大大超过平均利润的利润。垄断高额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它首先仍来源于垄断资本主义企业里的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垄断组织采用各种血汗劳动制度，提高劳动强度，剥削工人。此外，垄断资本家还通过提高消费品价格，把工人和其他居民的一部分收入转到自己的手里；利用垄断地位，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抬高工业品销售价格，把农民创造的一部分价值提为已有，通过垄断价格把垄断组织以外的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转到自己手里。垄断资本还通过不等价交换，掠夺殖民地、附属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以上说明，垄断组织通过垄断高额利润所得到的东西，正是工人、小生产者、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所失去的东西；还有一小部分则

是从非垄断的中小资本家那里夺过去的。所以，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和长期趋势来看，垄断价格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价值的总和，即没有突破价值规律的界限，只是使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样，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在垄断阶段仍然继续发生作用，只是这一规律的作用形式有所不同：在垄断前，它通过平均利润表现出来；在垄断阶段，则主要通过垄断高额利润表现出来。

垄断高额利润的增长，意味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更重，标志着垄断资本家剥削的手段更加毒辣。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美国垄断公司每年平均获得垄断高额利润二百四十三亿五千六百万美元，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九年，激增为六百七十四亿七千万美元。日本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一九三〇年为百分之一百八十二，一九五四年则达到百分之三百十三，一九六〇年更增加到百分之三百四十五。从这两方面数字的变化，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国家贫富两极的尖锐对立。

自由竞争形成垄断，但是，垄断并不能消灭竞争，相反，使竞争更加激烈了这是因为，竞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垄断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当然也就不可能消灭竞争。特别是，由于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垄断寡头手里，垄断组织为了扼杀对方，就更加不择手段地打击自己的竞争者，使竞争变得更加尖锐和残酷。在帝国主义时期，各个资本家之间、各个资本家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垄断组织同非垄断组织之间存在着竞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生产如何集中，要达到绝对的垄断是不可能的，总有相当数量的非垄断企业存在。即使在垄断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中，也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例如，美国在四百万家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就有三百万家以上。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之间必然要开展殊死的竞争。

各个垄断组织之间为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销售市场和交通

运输条件等，也存在激烈的竞争。

在同一垄断组织内部的各个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争夺市场、提高生产和销售份额的竞争。这种竞争甚至会导致某个垄断组织的分裂，出现新的垄断组织，开展新的斗争。

在托拉斯和康采恩中，各大资本家争夺领导权、股份控制权和利润分配权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垄断资本主义决不是象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鼓吹的那样，是什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相反，垄断加剧了竞争，使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全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更加严重了。列宁早就指出：“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正是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正是这种结合在造成崩溃，即造成社会主义革命。”

金融资本是万能的垄断者

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特征是垄断，第二个特征就是金融资本的形成和金融寡头的统治。随着工业中垄断的出现银行业也出现了垄断。在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银行起的是一种中介人的作用，它把社会上闲散的资金聚集起来，通过贷款的形式，供工业和商业资本家利用。到了帝国主义时代，银行由简单的中介人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

银行业的垄断使银行和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银行通过购买工业的股票渗入工业，工业垄断组织通过购买银行股票渗入银行。于是，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日益融合起来，形成了金融资本。“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

金融资本。”掌握庞大的金融资本的少数最大的资本家，就是金融寡头。金融资本控制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法，是实行所谓参与制”，就是通过金融资本家掌握的主要股份公司（“母公司”）去收买许多其他股份公司的股票，掌握其股票控制额，使它变成自己的“子公司”各个“子公司”又以同样的方法控制其他更多的公司（“孙公司”）等等，达到用较少的资本控制和支配比自己的资本大好多倍的资本，从而操纵国民经济，使劳动人民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被控制在少数金融寡头手里。一九六八年，美国十八个金融垄断财团控制的资产总额达六千七百八十四亿美元。其中，摩根和洛克菲勒两个财团是经济实力最强，势力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两个最大的金融垄断组织。一九七〇年，这两大财团所控制的资产总额达三千三百零四亿美元，大致为美国十八个金融垄断组织所控制的资产总和的一半，超过英、法、日本和西德四国的金融垄断组织所控制的资产总额。摩根财团所控制的企业遍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特别是基本工业如钢铁、电气、电子、化学等工业；在公用和交通运输部门，摩根财团更占绝对的优势，它在美国经济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企业比较集中，它的五大石油公司在一九六七年控制了美国本土石油开采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一。这两大财团对美国经济有决定性的影响。

列宁指出：“**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金融资本为了进一步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攫取垄断高额利润，不仅要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要控制国家政权。金融寡头用收买高级官吏和国会议员的办法，让他们充当代理人，控制国家机器；有时也亲自出马，占据国家的领导地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森豪威尔任总统的那届美国政府为例：艾森豪威尔是在洛克菲勒和摩根财团的支持下上台的，他的政府中二百七十二名高级官员，有一百五十名是大资本家。其中，国务卿杜勒斯是洛克菲勒财团基金会董事；国防部长威尔逊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另一个国

防部长盖获是摩根财团的首脑人物，一九六五年担任摩根保证信托公司的董事长；财政部长汉弗莱是克利夫兰财团主要企业韩纳矿业公司负责人。金融寡头不仅控制着国家政权，而且控制着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美国的新闻、出版、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事业，无不在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的控制之下。洛克菲勒财团还拥有规模最大的所谓“慈善事业”，以及各种基金会、学会、博物馆、医院和形形色色的所谓“福利”、“艺术”中心。这些都是洛克菲勒财团的统治权力伸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工具。

恩格斯曾经预言：在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力大大发展了，某些垄断资本集团不断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因而出现了一种现象：“**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这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当代帝国主义的一个突出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国家收购私人企业，实行所谓“国有化”，或由国家直接投资兴建所谓“国营企业”，是越来越多了。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在整个资本主义企业中所占的比重有了很大提高，一九六八年，西欧四个主要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所占的比重如下：

国 别	占职工人数的%	占资产的%
法 国	11.2	33.5
西 德	8.7	22.7
意 大 利	11.6	28
英 国	8.5	17

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它自己的特点。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建立一大批“国营企业”，战后又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垄断资本集团；同时，美国政府又采取“输血”的形式，将从人民手里榨取来的税收，支持垄断资本集团。

帝国主义国家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主要方式，除了实行“国有化”或兴建“国营企业”以外，还采取了下列方式来保证垄断集团可靠地获得垄断高额利润：（1）利用国库资金，利用人民缴纳的税款，来承担资本家投资的风险，如给资本家以补贴等；（2）通过国家的立法和预算，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垄断资本组织的重新分配；（3）利用国家权力加强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剧垄断资本对中小企业的吞并；（4）通过“国家”的形式和外交手段，在国际上进行剧烈的争夺市场的斗争，并且作为垄断资产阶级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有利的工具。帝国主义国家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方式尽管不同，但是它的目的总是为了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资产阶级国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决不象垄断资产阶级辩护士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因素”，能够对国民经济实行什么计划领导，恰恰相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丝毫也没有改变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它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为垄断组织服务并加强金融寡头统治的工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了垄断资本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加强了垄断资本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加速了帝国主义国家扩军备战的步伐，加剧了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它越来越受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同时进一步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物质前提。

资本输出使金融资本的密网布满全世界

“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资本输出在垄断前资本主义阶段就存在了。但是只有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才普遍起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组织对国内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积累了大量资本。但是，由于国内有利可图的事业差不多已经垄断完了，投资到国内原先不大发达的经济部门，又不能保证得到垄断高额利润，于是很大一部分积累起来的资本成了“过剩资本”。这一部分“过剩资本”到哪里去找最有利可图的出路呢？这就是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因为那里资本少，工资低，地价和原料都很便宜，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因此，垄断资本就通过直接投资（开矿山、办工厂、建铁路、设商店）和间接投资（贷款）的方式把资本输出到国外，贪婪地剥削经济落后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攫取垄断高额利润。资本输出是二十世纪初期才飞快发展起来的。一九七〇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总额已达三千多亿美元，比一九一四年增长了五倍多。

资本输出是垄断资本家追求垄断高额利润，向外扩张，剥削和掠夺各国人民，特别是经济落后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人民的重要工具。以旧中国为例，抗日战争前夕，在中国的外资达四十三亿美元，到抗日战争临近结束时猛增到九十八亿美元。其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投资最多，达六十亿美元。这些外资控制了我国百分之七十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百分之九十五的钢铁工业和石油工业，百分之七十五的电力和煤炭工业，甚至食品工业也有一半以上是外资经营的。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美帝国主义取代了日本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一九四八年，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包括所谓“美援”）占所有在华外资的百分之八十。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

观的条件和可能”。可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外资的长期大量入侵，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使我国人民生活陷于极端贫困的境遇，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总额有了巨大增长，美国成了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一九一四年，美国资本输出只有三十五亿美元，一九七〇年激增至一千五百五十五亿美元，五十六年中增长了四十三倍以上。随着资本输出的激增，垄断资本家的垄断高额利润更是大大增长了。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〇年，美国对外私人直接投资的利润总计为八百八十七点七亿美元，比美国到一九七〇年底为止历年对外私人直接投资总额还高出百分之十四。帝国主义在亚、非、拉投资的利润之高，是十分惊人的。例如，一九七〇年，美国在亚、非、拉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三，同年从亚、非、拉地区搜刮的利润则占海外直接投资利润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五。当代，帝国主义已成了剥削世界广大地区人民的最贪婪的吸血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国家除了继续发展私人资本输出以外，越来越重视国家资本输出。这种国家资本输出，最主要的形式是所谓对外“援助”。从一九四五年年中到一九七一年年中，美国对外“援助”总额高达一千四百九十六亿美元。这种对外“援助”，有所谓“赠与”和“贷款”之分。“赠与”表面上是无偿的，实际上是控制受“赠”者的锁链。毛主席早就揭露了美帝“援助”的反动政治目的：“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近年来，帝国主义国家贷款的比重日益增加，“赠与”的部分相应下降。这种所谓贷款，多数年息超过五厘，最高的达到八厘，此外还附加许多政治、经济、军事条件，它不但是一条吸血管，而且是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工具。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带

来了沉重的灾难。但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却竭力为这种侵略行径护，拚命鼓吹资本输出可以“帮助”不发达国家达到经济高涨。苏修叛徒竟然无耻地鼓吹，帝国主义可以用全面彻底裁军节省下来的开支去“援助”经济不发达国家，为亚、非、拉经济的发展开创一个新纪元。全世界一切被剥削和被奴役的民族和人民，已饱尝了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带给他们的苦难，苏修叛徒的这种论调的市场是越来越小了。

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一国的垄断组织首先是瓜分国内市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是同国外市场紧密联系着的。随着资本输出的增长，随着最大的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大，全世界资本和生产的集中也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这时候，几个国家的少数大垄断组织，就能够把世界上某些商品的生产 and 销售的绝大部分掌握起来。这些大垄断组织势均力敌，他们出于各自的私利，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暂时缔结国际性的协定或者同盟，规定国际垄断价格，划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限定产品数额等等，从而形成国际垄断组织。

这种垄断组织已超出一个国家界限，列宁称它们为“超级垄断”。这种超级垄断组织最早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二十世纪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既有新的国际垄断组织的产生，也有原有国际垄断组织的瓦解。据估计，截至一九六八年，国际化垄断公司在国外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九百四十亿美元，它们的国外子公司的年产值为二千四百亿美元。最大的五家国际化垄断公司是：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通用电力公司。由于国际化垄断公司的急剧发展，垄断财团对世界生产和贸易的垄断加强了。资本主义世界某些工业部门如橡胶轮胎、石油、烟草、药品、汽

车等，几乎完全为国际化垄断公司所控制。近年来，区域性的国际垄断同盟也有了新的发展。西欧共同市场和西欧自由贸易区，从经济上说是一种区域性的国际垄断同盟。但是，它的发展和扩大，是对当代美苏两霸妄图瓜分世界的抗衡和抵制。

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组织有了巨大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的原料供应基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资场所。以一九六九年为例，美国进口的原料来自亚、非、拉地区的比重是：锡矿石、铁钒土、天然橡胶达到或接近百分之一百，锰矿石百分之九十一·九，铜矿石百分之七十八·二，石油百分之六十二·九，铬矿石百分之四十一·六，等等。日本、西德、英国进口原料中来自亚、非、拉的比重也很大。因此，争夺原料基地的斗争，在国际垄断组织之间总是愈演愈烈。为了争夺中东的石油，许多国家的垄断资本都拚命打入这个地区，斗争特别尖锐复杂。

各国垄断组织争夺商品销售市场的斗争也很激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度夺得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霸主地位，它的出口贸易总额曾占资本主义世界的出口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但是，随着西欧、日本经济实力的上升，美国的霸主地位开始跌落了。一九七一年，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已下降到百分之十四·二。在亚、非、拉，在西欧、北美、大洋洲，各国垄断组织之间一再爆发激烈的市场争夺战。美国福特公司董事长亨利·福特二世面对日本汽车流行于美国西海岸的情况，曾经发出哀叹：“我们只是看到了事情的开始。等着瞧吧，这些日本鬼子不久就要染指美国中部了。”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

国际垄断同盟本来是各国垄断资本为获得垄断高额利润，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市场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国际性垄断组织。但是，各国垄断资本在瓜分世界的斗争中，达成协议，建立同盟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追逐垄断高额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斗争一

刻也不能停止。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鼓吹所谓资本国际化会给各民族之间带来和平的希望，这种谬论曾经受到列宁的尖锐批判。列宁指出，国际垄断资本组织“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事变完全证实了列宁的科学论断。

帝国主义列强为分割和重新分割世界领土而争夺

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必然要进一步发展到从领土上瓜分世界，占领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殖民政策，掠夺殖民地，早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只有到帝国主义时代，才开始了争夺殖民地的“高潮”，才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展开分割世界领土的激烈斗争。这是因为：

第一，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垄断造成了大规模的生产，生产规模愈大，需要的原料愈多，控制原料的产地也愈重要。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第二，殖民地是帝国主义输出资本最有利的场所。在殖民地，宗主国的垄断组织可以更加残酷地剥削和奴役那里的劳动人民，更容易用垄断的手段去消灭竞争者，保证资本输出能获得垄断高额利润。

第三，殖民地是垄断组织最有利的销售市场，宗主国可以在殖民地用关税壁垒来保证自己的垄断地位。

第四，殖民地还是帝国主义各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军事战略基地。宗主国可以在那里设置大量军事基地，掠夺大量战略物资，搜集大量兵员，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服务。

总之，殖民地是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只有占领殖

民地，才能充分保障垄断组织获得胜利”。因此，帝国主义国家总是拼命争夺更多的殖民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到一九一四年止，英、俄、法、德、美、日等六个帝国主义国家占领的殖民地达到了六千五百万平方公里，统治着五亿千三百万居民。其中，沙皇俄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仅次于英国而占世界第二位；当时俄国二千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就有一千七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是殖民地。列宁曾经深刻指出：“沙皇政府比其他各国政府更明显地表现了战争的反动性、掠夺性和奴役性。”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

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的国家。从十九世纪末叶起，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曾各按照其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势力而划定中国的某一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例如，当时长江中下游的省份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广东、广西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东北原被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以后，东北的南部又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在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过程中，沙皇俄国是“最先伸出魔掌的”。老沙皇“象贼那样”对中国进行侵略，霸占了我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面积。

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未被占据的土地都已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了。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分割世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帝国主义为了获得垄断高额利润，必然要向外进行侵略和扩张，为重新分割世界领土而争夺。这种扩张和争夺，取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谁掌握最大的实力，谁就可以夺取世界霸权。这种用实力来解决矛盾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通过战争争夺殖民地，通过战争争夺世界霸权，通过战争获取垄断高额利润。列宁指出：“现代战

争产生于帝国主义。”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引起的经济上的垄断，必然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激化，加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帝国主义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缓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它们就会铤而走险，发动战争，进行垂死挣扎。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我们理解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就会懂得列宁的名言“**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美帝国主义就是靠战争发家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大做军火买卖，大发战争横财。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垄断资本获得了三百八十亿美元的暴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获得了一千一百七十亿美元的暴利，从而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从这以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更把战争看作发财的捷径，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据统计，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共获得了一千五百五十四亿美元的暴利；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仅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两年，就获得大约七百六十亿美元的暴利。美国亿万富翁腰包里的每一块美元，都沾满了劳动人民的鲜血。只要存在帝国主义就存在着现代战争的根源。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制度。

但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制度，总是制造种种谬论，妄图欺骗人民。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炮制出笼的“超帝国主义论”，是一种最有代表性的谬论。考茨基故意抹煞这样的事实，即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扩张是由垄断资本的本质决定的。他拚命鼓吹这是帝国主义“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说什么“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因而世界上可以出现一种所谓永久的和平。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

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自从考茨基发明“超帝国主义论”以来，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把它奉为至宝，一再在新的条件下改头换面地宣扬这种“理论”。以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把当代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某种相对的、暂时的勾结，说成是什么“持久和平的结构”，妄图掩饰它们之间的深刻的矛盾，欺骗人民，麻痹对方，以利于帝国主义的争夺。在帝国主义之间，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今天暂时的妥协，只不过酝酿着明天更大的争夺。

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正如毛主席指出：“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十、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帝国主义是腐朽和垂死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它的各种矛盾都极端尖锐起来了。这些矛盾就象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着帝国主义的生存。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尽管帝国主义张牙舞爪，其势汹汹，其实它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就腐朽没落了。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是由垄断统治带来的，垄断是帝国主义腐朽性的经济基础。

帝国主义的腐朽性，首先表现在垄断组织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人为地阻止技术进步，使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停滞的趋势。在垄断前，资本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为了在竞争中打败对手，不能不关心技术的改进。到了垄断阶段，由于垄断资本家控制了某些部门生产的绝大部分，他们可以通过规定垄断价格，来获取垄断高额利润。这样，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因也就在一定程

度上削弱了。在垄断统治下，资本家害怕技术进步不利于他的垄断地位，因而常常人为地阻碍新技术的发展。

垄断资本家为什么这样害怕和阻碍技术进步呢？一是因为新技术新设备的广泛运用，固然会使产品成本降低、产量增加，但是也会使垄断资本家原有的机器设备贬值或者报废给他们带来无形磨损二是因为新技术、新设备的采用，会引起同类的更便宜的商品加入竞争，会威胁到他们的垄断地位。垄断资本家往往采取缩减生产的方法来维持垄断价格，榨取垄断高额利润。因此，许多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新技术和新发明，一旦被垄断资本家收买了专利权以后，就被打入冷宫。象人造汽油法，因为不利于石油公司的垄断，竟被束之高阁整整达二十年；原子能的发现本是一项伟大的科学成就，但却被帝国主义用来制造侵略杀人的原子武器，而不能广泛地用作工业的动力。

垄断阻碍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速度逐步下降。以美国为例，它的工业生产从一八七一年到一九〇〇年近三十年时间内，大约增加了三点九倍。但是，在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二九年近三十年时间内，只增加了二点七倍；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五九年近三十年时间内，仅仅增加了一点七倍。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〇年这一时期，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百分之四点四。美国生产发展速度越来越缓慢，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

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停滞腐朽的趋势，这并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就绝对停止了。列宁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这是因为自由竞争形成垄断，但是垄断并不排除竞争，只是使竞争变得更加尖锐和残酷。各个垄断资本集团在竞争中，一方面采用暴力、贿赂、讹诈、欺骗等等极其凶狠残忍的手段以打

垮对手；另一方面，有时也不能不采用一些革新技术、降低成本等经济手段来挤垮对手。同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会不断发生变化。在生产力发展受严重阻碍的总趋势下，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有的地位下降，有的越来越衰落，也有个别的可能跳跃式地上升。所以在垄断时期，不排除个别时期、个别国家、个别部门的生产技术有较快发展的可能性。但这不能改变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和技术发展的总的停滞趋势。

在帝国主义时期，个别国家在生产技术上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但是，它往往是暂时的和畸形的。就拿日本来说，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一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这种增长趋势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日本生产的较快发展，主要是由于美帝对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了大力的扶植，由于美帝发动侵略、侵越战争，使日本垄断资本家大发横财。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侵朝战争期间，美帝对日本至少支付了二十多亿美元的军事“特需”订货。在侵越战争期间，美帝对日本的“特需”支付在六十年代上半期每年三、四亿美元，从一九六五年起，每年增加到五、六亿美元。美帝还给日本垄断资本家提供大量贷款，对日本重工业进行直接投资，向日本大量输出技术专利权等等。同时，日本垄断资本对国内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从国家预算中领取大量补助金，也对日本工业的较快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日元（日本货币）对外比值的偏低，则帮助了日本货物在争夺世界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以上说明，推动日本工业发展的一些因素，都是不可靠的，不能持久的。日本经济的较快发展，不仅是暂时的，而且是畸形的，缺乏基础的。首先，日本在盲目发展工业的同时，农业生产却日趋萎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麦类生产直线下降，豆类大幅度减产，大米生产从一九六八年开始逐年下降。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〇年，日本食用农产品的自给率从百分之九十，降低到百分之七十三。其次，资源严重依赖进口，商品大量指望外销。包括铜、铝、铁矿石、石油、原煤等在内的十项主要资源

依赖从国外进口的比率，一九六〇年为百分之七十一，一九七〇年增加到百分之九十。日本工业产品依靠外销的比率，从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十八点三，增加到一九六九年的百分之三十点一。其中，合成纤维织物为百分之四十六点四，缝纫机为百分之六十七点四，船舶为百分之六十八点九。大量事实表明，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十分脆弱。今后要在长时期内按现有速度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停滞的趋势必将占上风。

国民经济军事化，是帝国主义经济发展必然要走的死胡同。它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帝国主义腐朽性日益加深的具体表现。帝国主义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以逃避经济危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夺取垄断高额利润，便疯狂地扩军备战，把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用来养活庞大的军队，用来制造杀人武器，用来进行以战争为目的的研究工作，用来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军事化，首先表现在军费增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整个财政支出中的国防开支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大。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七〇年，美国直接军费开支共一万一千多亿美元，平均每年在四百五十亿美元以上。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财政年度，直接军费共七百八十三亿美元，加上退伍军人津贴一百一十七亿美元，宇宙空间费用三十二亿美元，三项共达九百三十二亿美元。其次还表现在，军事工业和军事科学技术在整个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大批劳动力从社会财富的生产领域转移到军工生产和军事科研部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度，美国几个部门从事军工生产的人数及其在这些部门的总人数中的比重是：电子装置十二万六千五百人，比重是百分之三十三点八；无线电设备、电视机和通讯工具二十五万六千九百人，比重是百分之三十八点六；飞机和飞机零件六十一万五千九百人，比重竟达百分之七十二点四。美国全国科学

技术人员中，有三分之二同军事和空间技术研究有关。在美国七千七百万劳动力（不包括武装部队）中，大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在经济上依靠国防部的军事订货来维持就业。

帝国主义全面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美国每年把近一千亿美元花在扩军备战和进行侵略上，而生产的产品，不是用于战场屠杀人民，破坏社会财富，便是塞进仓库，过不多久便被垄断企业当作一堆废钢报销，甚至在出厂以前就因为更新式武器的出现而成为“过时”的废物。国民经济军事化还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军事工业恶性膨胀，民用工业萎缩不前。美国二十年来，生产导弹、飞机、宇宙飞船及航空空间工业部门的产值增加了六倍。相反，民用工业发展很慢，有的甚至减产，例如纺织工业，一九七〇年产量比一九五〇年减少了百分之十二。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使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白白被浪费掉，这是对社会财富的极大破坏，是帝国主义腐朽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帝国主义的寄生性或腐朽性，还明显地表现在资产阶级日益成为单纯的食利者阶层。所谓食利者阶层，就是指完全失去同生产过程的联系，专靠“吃利息”为生的一些人。资产阶级本来就是不从事生产劳动，专靠剥削工人来过奢侈生活的。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就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企业完全交由专职的经理人员去管理。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完全同生产过程脱离了联系，单纯凭借股票等有偿证券的收入过着寄生生活。列宁早就指出：“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例如，一九五〇年美国的红利和个人利息收入总共为一百九十五亿美元，一九六三年已达到五百零三亿美元，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七，而同期的国民收入只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二。到了一九七〇年美国的红利和个人利息收入已高达八百九十七亿美元。美国的垄断巨

头，正是依靠这些剥削收入，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美国的一些财团老板，不仅占用大量土地建造别墅、高尔夫球场、狩猎场，大肆挥霍，寻欢作乐，甚至相互比阔。一九六四年，美国一个大垄断资本家福特为了一个女儿过生日，一次宴会就花掉五十万美元。过了不久，另一个大垄断资本家梅隆为了压过福特，在一次为把他的女儿介绍给“社交界”而举办的宴会上，竟花去一百万美元，充分暴露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寄生性。

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资本输出急剧增长。随着资本输出的增长，少数最富有的国家可以凭着资本输出，变为专门剥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食利国，成为叮在多数不发达国家身上的寄生虫。据统计，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〇年，美国对外私人直接投资的利润共达八百八十七亿七千万美元，比美国到一九七〇年年底为止历年对外私人直接投资总额还高出百分之十四。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一九四六年为三十亿美元，一九六九年增加到一百一十七亿美元。但是在这二十四年中，仅直接投资利润一项，美国就从拉丁美洲各国榨取了二百三十四亿九千万美元，比这一时期美国直接投资净额还多得多。

美国每年从海外搜刮得来的利润，大部分汇回美国，供一小最垄断资产阶级挥霍。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〇年期间，汇回美国的利润高达四百三十四亿美元。这一期间未汇回的利润一百九十亿美元则被用作再投资，进一步加强对外掠夺。这样，随着美帝国主义在海外投资和利润年复一年地增加，它的寄生性也年复一年地加深了。

这一切证明，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必然要反映到工人运动中来。工人贵族的形成和修正主义的出现，就是帝国主义腐朽性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列宁指出：“食利国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

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中的两个基本派别。”垄断资产阶级对殖民地、附属国和本国的无产阶级进行搜刮和剥削，提取了大量的垄断高额利润。他们为了镇压工人群众的反抗，就在大量垄断高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在工人队伍中收买一批工贼，使之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是一批工人贵族，他们领取高薪，过着资产阶级化的生活，忠实地为垄断资产阶级效劳。他们混在工人队伍中，专门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破坏工人运动。这个工人贵族阶层，是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

垄断资本的高额利润，是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帝国主义条件下，随着工人贵族这样一个阶层的产生，维护帝国主义统治的修正主义理论和路线也就出现了。工人贵族是披着工人外衣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理论。工人贵族和修正主义者是潜伏在工人运动中的最阴险的敌人，是革命躯体上的脓疮。如果不根除这个脓疮，帝国主义将会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机会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可恶的发展，并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列宁还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资产阶级还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词藻作为幌子，来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真相。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些虚伪的“面纱”越剪越小了，谁要起来反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就进行残酷的镇压。列宁指出：“这一新的经济基础，即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就是从民主制转向政治反动。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在美国，不仅起来进行抗暴斗争的人民群众遭到了美国政府的镇压，就连主张非暴力主义的人也遭到杀害。一九六八年，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就因为反对种族歧视，争

取民族权利而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

同政治上的全面反动相适应，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上也日益腐朽堕落。在帝国主义国家，凶杀、色情书报和电影充斥市场。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地，就有三十家专门拍摄色情影片的公司。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着奇装异服，跳扭摆舞和“硬甲虫”爵士乐队到处皆是；叫猴子猩猩乱涂油彩的“印象派”画展风行一时。甚至还举办什么国际性的妇女“哭”比赛和未满周岁的幼儿爬行比赛。帝国主义的文化艺术无聊、腐朽已到了极点。至于盗窃、流氓、吸毒等等犯罪活动，更是泛滥成灾。

面对着这样糜烂透顶的社会，许多青年精神极端空虚，生活毫无目的，感到前途十分渺茫。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美国“第一次面临着一种对自己的理想、制度和前途的信心大规模瓦解的局面”，“面临着一场多边危机”。有的直认不讳地说：“危机的确是精神上的，但是它们根源在于我们的自吹自擂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明显失败。”（一九七〇年七月六日美国《新闻周刊》）正是在帝国主义的深刻的矛盾中，一部分先进分子逐渐觉醒起来，接受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团结广大群众，同帝国主义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由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垄断所决定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表明了帝国主义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可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斯大林说：“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资本主义在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不仅促进了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而且使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更为集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国内外一切矛盾严重激化了。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内外一切矛盾严重激化，所以，帝国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求垄断高额利润，加紧剥削和掠夺工人，使亿万劳动群众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垄断资产阶级采取各种血汗劳动制度，提高劳动强度，恶化劳动条件，肆无忌惮地不断加强工人的剥削。他们还有意识地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缩小工人的购买力。如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〇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生活费用无不逐年上升。在这一期间，美国的生活费用上升百分之二十六点八，英国上升百分之三十五点三，法国上升百分之三十点九，西德上升百分之二十点六，日本上升百分之四十四点四。通货膨胀，生活费用上升，而工资却没有相应增加，这就使劳动人民生活进一步恶化。垄断资本还利用国家政权，通过强征各种苛捐杂税的办法，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掠夺。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七〇年，美国课征的税收增加了近十六倍，即从一九四〇年的一百六十五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增至一九七〇年的二千七百八十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沉重的税收，象千斤重担那样，压得劳动人民连气都透不过来。

垄断资本为了维护它的经济利益，必然要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专政，运用国家机器加紧对工人镇压。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

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帝国主义为了实行法西斯专政，镇压人民，将反动政权机构扩大到十分惊人的程度。以美国为例，平均每二十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在反动的国家政权机构中任职。

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在政治上的血腥镇压，促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加深压迫愈重，反抗也就愈烈。千百万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日益觉醒，不断掀起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显然缩小了的数字，一九七〇年，美国工人阶级举行了五千六百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共三百三十万人。一九七一年，美国又爆发了五十万电话工人的全国性罢工和十六万铁路工人的大罢工。美国工人在罢工中喊出了“反对（侵略）战争、反对贫困、反对镇压”的战斗口号，日益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根据英国官方公布的材料（显然也是缩小了的数字），一九七〇年，罢工达到三千八百八十八次，参加罢工人数达一百六十五万。一九七一年，英国因罢工损失了一千三百五十万个工作日。日本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浪潮也是风起云涌。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所谓“劳资争议”事件（其实是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从一九五五年的一千三百四十五件，增加到一九六九年的五千二百八十三件，增加了二点九倍。同一时期，参加这种事件的人数从三百七十四万八千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四十八万三千人，增加了近三倍。

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帝国主义的心脏造反，促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不断地给垄断资本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帝国主义的命运已越来越岌岌可危了。

“殖民地是用火和剑夺取来的”。帝国主义用武力夺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后，就对这些地区和国家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

为了实行政治控制，就扶植傀儡，驻扎军队，设置军事基地为了便于经济剥削，就强制开辟通商口岸，控制海关和对外贸易，垄断金融和财政，强行夺取开矿、开厂和内河航运等特权。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搜取垄断高额利润，残酷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使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帝国主义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同当地封建势力和买办资本相勾结，严重束缚这些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还采用各种手段，强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单一化”，只生产外国垄断组织所需要的几种商品，造成经济片面和畸形的发展。这样，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既不能自立，也不能自给，只能仰赖于帝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出现新的高涨，许多国家和地区挣脱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锁链，走上了独立的道路。但是，帝国主义是决不甘心自动地退出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它们除了继续采用老殖民主义的手法之外，更多的是采用新殖民主义的手法。它们打着所谓经济“援助”的幌子，妄图达到控制这些新兴的独立国家的阴险目的：通过“援助”，保护它们在受“援”国的投资和其他利益，并取得进行新投资的特权；通过“援助”，推销剩余物资，并作为进行商品倾销的一种手段；通过“援助”，干预和支配受“援”国的经济政策，控制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有些国家不上帝国主义的当，帝国主义就策划侵略、颠覆阴谋，纠集反动势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进步政权。

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血腥奴役，使它们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矛盾更加扩大，更加激化。从帝国主义强盗的铁蹄踏上亚、非、拉人民神圣土地的那一天起，热爱自由、独立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就拿起石块、弓箭、长矛、火炮到处给帝国主义以迎头痛击。帝国主义剥削愈重，压迫愈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就愈激烈。十月革命以后，民族解放运

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互支持相互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后备军。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

帝国主义国家从经济上和领土上瓜分世界的斗争，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几个大国争夺霸权，争夺领土，相互厮杀，相互削弱，有利于受压迫、受剥削的民族和人民起来造反。

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有些国家发展较快，有些国家发展较慢，有的国家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还会跳跃式地前进。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成为它们在政治上发展不平衡的基础。这就是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引起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

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代都是起作用的。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大大加剧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占有大量的殖民地，在全世界占据垄断地位，它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它所霸占的世界各地掠取高额利润，这样就使它的生技术出现停滞的趋势。这时，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则利用技术发展的新成果，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就开始超过了英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第一位。二十世纪初，德国也超过了英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第二位。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同时也就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它们之间实力对比一旦发生变化，就必然要引起重新瓜分势力范围、争夺殖

民地的狗咬狗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继续发生作用，它的特点是：美国地位下降，英国继续衰落，西德、日本跳跃式地上升，意大利和法国有相当的增长。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九年的二十年间，这些国家国内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美国前十年为百分之三点九，后十年为百分之四点三；英国前十年为百分之二点五，后十年为百分之三；西德前十年为百分之七点四，后十年为百分之五点二；法国前十年为百分之四点五，后十年为百分之五点九；意大利前十年为百分之六点一，后十年为百分之五点六；日本这时期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在工业生产、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国际金融力量等方面的力量对比都出现了新的不平衡情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必然加剧这些国家之间为争夺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而争斗。

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厮杀，相互削弱，在帝国主义战线中出现薄弱环节。这就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埋葬帝国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列宁在对帝国主义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帝国主义战线将在它们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国或数国内获得胜利。列宁不仅为我们制定了夺取胜利的革命理论，而且为我们树立了革命实践的光辉榜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列宁就抓住了这个环节，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发动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暴力摧毁了俄国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和亚洲、欧洲一些国家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实了列宁的科学论断。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军，

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使帝国主义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之中。

世界形势尽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今天的时代并没有变。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所作的科学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它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但是，它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它愈接近死亡，就愈要进行垂死的挣扎。我们要认清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虚弱本质，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团结全世界革命人民，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捣乱，是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表现；失败直至灭亡，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个历史规律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十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参加 世界 帝国主义行列

——社会帝国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在帝国主义逐步灭亡的过程中，在二十世纪中叶，出现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是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把苏联变成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斥责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头目考茨基之流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和考茨基之流一样，也是社会帝国主义者，所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贩卖修正主义，充当帝国主义辩护士，而且掌握着国家政权，把列宁亲手创建的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社会帝国主义就是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帝国主义。它在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出现，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这是一个极其凶恶的帝国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

无论资本帝国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就其基本经济特征来说，都是相同的。它们的主要经济基础都是垄断资本主义。但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两种形式，即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都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社会帝国主义同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方面的差别，是由垄断资本产生的不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剧烈的竞争过程中，经过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在那里，首先出现和大量存在的，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服从于垄断资本，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相结合，才产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大权以后，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变质产生出来的。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以后，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变为走资派所有制，把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判断一种社会经济的性质，不是取决于它挂着什么招牌，而是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即取决于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由谁支配，为谁服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以后，全面控制了政治、经济权力，在经济领域中

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大肆鼓吹“卢布是衡量劳动荣誉的尺度”，“利润是担任经营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最好的鉴定”等奇谈怪论。苏修经济学家利别尔曼在苏修叛徒集团支持下，抛出了一个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国营企业管理方案，并广泛地进行了“试验”。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全面推行所谓“新经济体制”，把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加强了官僚垄断寡头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经过这样一番“改造”，原来属于苏联劳动人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已被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有，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支配，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苏联的工人和农民被剥夺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的悲惨地位。苏联今天尽管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但是在实际上，那里原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蜕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一旦篡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权，就必然要把它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这伙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愈是把更多的生产资料据为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所有，就愈可以假借“国家”的名义来支配整个社会的财富。这样，既有利于继续用国家的招牌来欺骗劳动人民，又可以使国家充当总资本家，把整个国民经济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因此，苏联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一切、主宰一切。这种情况，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罕见的。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虽然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还没有达到苏联今天这样的程度。正因为这样，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特别严重。列宁曾经指出：“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使生产更加垄断化、更加国有化的措施，必然会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增加被剥削者反抗的困难，加强反动和军事专制，同时，必然会使大资本家靠剥削其他阶层而得来的利润急剧增加，

必然会使劳动群众由于要向资本家缴付数十亿借款利息而遭受几十年的奴役。”列宁的这段话，今天读起来，多么象是针对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剖析呵！俄国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曾经针对老沙皇的黑暗统治，悲愤地责问：“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今天，在俄罗斯，十月革命的英雄儿女正遭受重重苦难，毫无快乐和自由可言；而以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则骑在苏联人民的头上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库，骄奢淫逸，专横暴虐，作威作福，吮吸着苏联人民的血汗。以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人格化”。

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组织形式是“联合公司”。联合公司产生的途径，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垄断组织有所不同，它主要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由大企业兼并许多中小企业组成的。

联合公司这种垄断组织在苏联发展极快。一九六一年，苏联还只有两个联合公司，而十年以后，到一九七一年六月，联合公司便已发展到一千四百个，拥有一万四千多家企业和七百七十万职工。将近三分之一的工矿企业，已被吞并到联合公司中。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一年在苏修“二十四大”上叫嚷：“建立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的方针必须更坚决地加以贯彻—将来它们应该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核算单位。”按照苏修领导集团的旨意，联合公司自一九七一年以来正在继续扩大它的统治领域，迅速囊括苏联工业的一切部门。

苏修的联合公司有以下三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被兼并的企业“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法人的权利”，联合公司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核算单位”，对其所属的企业拥有一切权利。

第二种，被兼并的企业有一些失去了法律上的独立性，有些还“保持企业的相对的独立性”。

第三种，被兼并的企业“仍然是独立的”，但是要接受联合公司的管理。

在以上三类联合公司中，苏修着重发展的是第一种类型的联合公司。它是参照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模式、“利用美国垄断组织的“组织系统图建立起来的。苏修宣称联合公司“包含着被压缩的未发芽的苏联工业的未来结构”，是一种“独特的苏联康采恩”。联合公司不仅搞生产，而且也搞原料的供应和产品的销售。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的是，苏修的联合公司同国家政权的结合更加密切。它不仅是一个基本经济核算单位，而且在计划、生产、供应和销售方面，拥有原来属于总管理局甚至主管部的一部分权力。大型的地区性的联合公司，“不仅是一个生产综合体，而且是一个经济管理机关”。在管理经济的各部和联合公司之间，没有中间机构。联合公司的经理，同各部部长和副部长一样，被列为苏修的“国民经济领导人员”，他们是以勃列日涅夫为总头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重要成员。所以，联合公司是国家机关和垄断组织的统一体，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管理体制的重要形式。

本来，撇开联合公司这种垄断组织，苏修的国营企业早就已经是资本主义化的了。在苏修的国营企业里，工人群众已经从企业主人的地位沦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掌握企业领导权的，是苏修领导集团的代理人。按照苏修《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的规定，企业经理掌握着“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力”，有权确定企业的人员定额，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对企业的工作人员采取奖励措施和进行处分”，有权确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等等。总之，即使没有联合公司，苏修领导集团委派的经理、厂长，也已经是国营企业中拥有一切权力的统治者，广大的工人也已经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现在，有了联合公司这种垄断组织以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能够进一步加强对苏联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了。这个新型的大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手中的国家机器和联合公司，假

借国家的名义，通过税金和上缴利润等形式，大肆掠夺苏联工人的劳动果实，用来供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挥霍浪费，用来对内镇压苏联人民，对外推行侵略、扩张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工矿企业中大力发展垄断组织的同时，也在农业中发展各种垄断组织，其中包括：（1）农业托拉斯，这是专业化国营农场的联合组织，如养禽业托拉斯，牲畜业托拉斯，蔬菜业托拉斯等（2）农业联合公司，这是一种几个国营农场、几个集体农庄、或者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联合组织；（3）农业工业综合体，也叫农业工业联合企业，这是由农业企业直接办农产品加工厂的联合企业。通过这些农业垄断组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加强了对苏联广大农村的控制和掠夺。

苏修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垄断了国民经济命脉，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进一步加重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一九六七年开始的所谓“谢基诺试验”，最有力地证明了雇佣劳动制度在苏联全面复活了。

谢基诺是设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化学联合企业，它雇用职工七千多人，生产化肥和其他化学产品。一九六七年八月，按照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开始了所谓“加强工作人员关心增加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少工作人员数量的经济试验”。这个“试验”通过兼职、合并工种、扩大服务范围等措施，不断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达到裁减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同时规定，企业的工资基金总额几年不变，因裁减人员而节省下来的工资基金，大部分留归企业一小撮特权阶级支配。这个“试验”被勃列日涅夫吹捧为“完善报酬的榜样”，已在全苏推广。

“谢基诺试验”的核心，是用“减少生产人员的数目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企业“发挥潜力”。怎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呢？“谢基诺试验”证明，可以用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来达到这个目的。据一九七一年六月统计，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自从搞了这个“试验”以来，共裁减了一千多名工人，占全部职工七分之一以上。其中，由于

提高机械化程度而裁减的工人仅六十八人，占百分之六；而在被裁减的工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由于在业工人劳动强度的提高而被赶出厂门的。马克思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在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本对工人无偿劳动的榨取首倍地加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用“泰勒制”等所谓“科学管理方法”来迫使工人极大地提高劳动强度，以加强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苏修叛徒集团竭力推广的“谢基诺试验”，就是被列宁强烈谴责为“血汗制度”的泰勒制的翻版，其目的就在于迫使苏联工人一个人于几个人的活，穷凶极恶地从苏联工人身上压榨更多的剩余劳动，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

到一九七一年七月止，实行“谢基诺试验”的一百二十个企业，已经裁减了六万五千人。现在，一支失业大军已在苏联出现了。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制度，已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推到了顶点。它已经并将继续受到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反抗。

苏修“新型的国际关系”是新殖民主义的别名

垄断资本为了追逐垄断高额利润，在加紧剥削国内人民的同时，必然要向外扩张，通过资本输出和实施殖民主义政策，掠夺和奴役其他国家的人民。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然也不会满足于对苏联工农群众的剥削，它必然还要把魔爪伸向国外。首当其冲的，就是它那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兄弟国家”。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网罗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面，口头上说苏修同这个大家庭里的所谓“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国际关系”，实际上，他们所实施的，完全是帝国主义宗主国同殖民地之间的猫鼠关系。他们采

用最蛮横、最凶恶的手段，对这些国家严加控制。军事上，利用“华沙条约组织”和双边协定，在一些国家驻扎重兵，甚至公然出动几十万军队，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上，通过收买、颠覆，甚至直接用刺刀制造傀儡政权。经济上，以“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为工具，推行所谓“经济一体化”、“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对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实行新殖民主义的统治，进行骇人听闻的剥削。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所推行的“经济一体化”，目的在肢解经互会成员国的国民经济体系，造成单一的畸形发展的殖民地经济，妄图把这些国家的领土、人口、资源统统都“一体化”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里去。苏修的“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都是从属于“经济一体化”，为实现“经济一体化”的上述目的服务的。

苏修借“经济一体化”奴役其“兄弟国家”的手法之一，是破坏经互会各国的燃料和原料工业，造成苏修的高度垄断。据经互会和苏修官方发表的统计资料，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五国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期间，五种主要燃料和原料进口中苏修供应所占的比重如下：石油百分之九十三，煤百分之六十一·九，铁矿石百分之八十六·八，生铁百分之九十七·五，原棉百分之六十四·三。苏修高度垄断了这些经互会成员国的燃料和原料的供应，就卡住了这些国家的脖子。

苏修借“经济一体化”奴役其“兄弟国家”的手法之二，是迫使经互会各国片面发展苏修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如迫使波兰发展苏修所需要的造船工业，迫使捷克斯洛伐克专门为苏修制造铁路机车车辆，迫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展采矿机械工业，为苏修制造采矿机械设备，迫使保加利亚发展苏修所需要的蔬菜、水果生产，迫使蒙古片面发展畜牧业，为苏修提供肉类。这样就使“兄弟国家”变成了苏修的附属加工厂、果菜园和畜牧场。

为了加快推行“经济一体化”，更有效地控制经互会成员国，苏修搞了一整套“超国家机构”，如“国际冶金工业合作组织”、“国

际化工工业合作组织”、“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国际投资银行”，等等。这些“超国家机构”，实质上就是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控制的国际垄断组织。通过它们，把经互会成员国国民经济的要害部门都控制在苏修手里。

苏修卡住“兄弟国家”的脖子，迫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适应苏修的需要畸形发展，就能够在垄断和殖民统治的基础上进行掠夺性的贸易。苏修在经互会成员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优势。据苏修杂志等透露，一九七〇年，苏修占蒙古对外贸易额的百分之八十，占保加利亚对外贸易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外贸易额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占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左右。苏修在对外贸易中利用它对这些国家的霸主地位，进行不等价交换，进行残酷的剥削。苏修用一辆自行车换蒙古的四匹马，用只玩具羊换蒙古的一只活羊。苏修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电力机车比从西德进口的价格低五分之二，苏修出售给捷克斯洛伐克的铁矿砂却比售给西德的贵一倍以上。苏修卖给东欧一些国家的原子反应堆，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四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计划委员会负责人抱怨说，对苏贸易每年使他的国家遭到约二十亿马克的巨大损失。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资本帝国主义一样，以“援助”为名，向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进行资本输出。截至一九七一年初，苏修以长期“贷款”名义向保加利亚输出资本共达二十一亿五千万卢布。苏修通过资本输出，在掠夺利息收入的同时，控制这些国家的建设方向，并借此带动商品输出，用高价大量倾销滞销产品和设备，以攫取垄断高额利润。

苏修在输出资本的同时，又利用其“经济一体化”中的霸主地位，借口经互会各国从它进口的原料日益增加，强迫一些国家拿出资金和劳动力替苏修建设工厂，开发矿藏，进行赤裸裸的掠夺。例如，一九六六年，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向苏修提供了五亿卢布专用贷款，以供应钢管、石油设备的形式，用来开发秋明油田。一

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又被迫提供大批载重汽车、大口径管道，用来建造西伯利亚天然气输气干线。苏修甚至征用保加利亚的几万劳动力到苏修国内去从事苦役，直接剥削他们的剩余劳动。

列宁曾经痛斥过老沙皇是以“**农奴制特权的原則对待邻国**”。苏修今天对待邻国的所作所为，比老沙皇有过之无不及。为苏修的“经济一体化”服务的所谓“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其实质就是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种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分工”。苏修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就象希特勒德国的“欧洲新秩序”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那样，无非是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别名罢了。

苏修既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也就必然要受帝国主义规律的支配。它当然不会以在它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范围内实施殖民统治为满足，而必然要在世界广大地区垄断更多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来源和投资范围。资源丰富、经济落后的亚、非、拉国家，便成了苏修进行殖民扩张的对象。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对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实际上是在“援助”的幌子下，力图把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美帝国主义争霸世界。

“苏援”是全面打入受“授”国的开路工具，附有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它主要是“军援”，即推销过时的军火，并借此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控制和干涉受“援”国。苏修每年给亚、非、拉地区成十亿卢布的“援助”，按比例是三分“经援”，七分“军援”；重点首先是中东和波斯湾地区，其次是南亚次大陆。中东和波斯湾地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盛产石油。苏修力图通过“苏援”，在那里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并控制这一地区许多国家石油的勘探、开采、提炼和运输，垄断石油的收购。南亚次大陆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有着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苏修通过军火输出、资本输出和不平等贸易，掠夺那里的资源，干涉那个地区国家的内政，并且伺机取军事基地。

南亚次大陆上接受“苏援”最多的是印度，它的经济命脉的很大一部分，已被控制在苏修手里。到一九七〇年底，苏修“援建”的企业已控制这个国家的工业生产的比重如下：钢产量的百分之三十，炼油的百分之六十，重型机器产品的百分之八十五，发电量的百分之二十，石油产品的百分之三十，发电备的百分之六十。苏修在它的“援建”工程中，不仅垄断工程设计，在建厂期间取得全部控制权，而且在开工投产后，使印度仍不能摆脱对苏修的依赖。在设备维修、零件和配件供应、关键性原料的供应等方面，仍要依赖苏修。此外，苏修还利用“苏援”要求印度以实物偿还的规定，进一步支配印度全国的生产。印度的一些皮鞋厂、服装厂、颜料厂、皮革厂、灯泡一等企业，是适应苏联的需要建立起来的，这些厂的产品不是用于印度本身，而是输出到苏联还债。苏修就是这样在“援助”的幌子下，利用印度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把印度变为它的附属加工厂。印度报纸为此曾发出悲叹：“印度是稳稳当地放在俄国篮子里的一个鸡蛋。”

苏修叛徒集团吹嘘说，发展中的国家只有依靠苏修的“援助”，同苏修实行“国际分工”，“才能顺利地达到真正的政治与经济独立，并与帝国主义的强权对抗”。真是弥天大谎。苏修自己也不得不供认，苏修同发展中国家的分工，“是在以前形成的劳动分工相当强烈的影响下形成的”，其特点就是“工业品、特别是机器设备交换原料、热带商品、燃料等”。苏修橡胶进口的百分之九十五，棉花进口的百分之九十二，都是从亚、非、拉地区搜取的。中东的石油、智利的铜、玻利维亚的锡、东非的肉类和索马里的铀，就是苏修用陈旧落后的机器设备交换的对象。这种“工业苏联、农业亚非拉”的“国际分工”，不正是典型的宗主国同殖民地之间的分工吗？

苏修叛徒集团吹嘘说，它贷款的利率只有年息二厘五，比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率低，体现了“无私的援助”。实际上，苏修的贷款是一种隐蔽的高利贷，它把高利率隐藏在所提供货物的高价中。苏修提供给亚、非、拉国家的贷款，规定必须用来购买苏联

的货物。这些货物主要是过时的武器、陈旧的设备和滞销商品，不仅技术落后，质量低劣，而且价格奇昂，比国际市场价格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有的甚至高两倍。此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经常以债主的身份进行逼债，并强制规定债务国要通过向苏联供应某些原料的方式来还债。据报道，中东一个国家根据协定，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〇年期间，对苏联的欠债和外贸赤字等必须一律用石油偿还，而且价格要比国际市场价格低百分之二十。“无私的援助”实际上是残酷的剥削。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完全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为着推行新殖民主义，他们同世界上一切最反动的势力勾结在一起，破坏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出钱出枪，帮助各国反动派屠杀革命者，在许多亚、非、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千方百计支持各国反动派扑灭亚、非、拉的人民武装斗争烈火，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扮演着世界宪兵的角色。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第二次十月革命的前夜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它张牙舞爪，残酷地剥削和压迫苏联国内的劳动人民，穷凶极恶地掠夺和奴役其他国家的人民，特别是亚、非、拉地区的广大人民，比资本帝国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一方面看，它是真老虎，必须认真对待。但是，从本质上看，象一切帝国主义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时又是纸老虎。因为任何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同时也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例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处处显露出极度寄生和腐朽的特性，它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极度腐朽性，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停滞上面。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当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苏联的工业生产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八年的十年间，曾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四的高速度蓬蓬勃勃地发展；当苏联作为社会帝国主义出现于世界的时候，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〇年的十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便陡降为百分之八点六，一九七一年又降为百分之七点七，一九七二年继续下降到百分之七以下。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下，苏联农业生产的情况更糟，多次发生粮食生产严重减产，以致不得不大量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粮食。由于工业衰退，农业下降，牲畜减少，通货膨胀，市场商品奇缺，供应紧张，劳动人民生活日益穷困。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极度腐朽性，还表现在把大量人力物力疯狂地用于扩军备战。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对外侵略和扩张，必然要实行希特勒式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据估计，苏修的军费开支比官方承认的数字高三倍到四倍；七十年代以来的军费开支每年高达八百亿美元左右，占国家预算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苏修为了争夺海洋霸权，大肆扩建海军，用于建造舰艇的军费逐年大幅度增长。据估计，苏修在六十年代用在这方面的费用平均每年为二十亿美元，一九七〇年增加到三十亿美元，比美国同年建造舰艇的费用还多九亿美元。大量社会财富不用来扩大再生产，不用来改善人民生活，而用来为社会帝国主义扩军备战、对外实行侵略和扩张政策服务，这是社会帝国主义腐朽性的突出表现。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极度腐朽性，还表现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和社会生活的严重腐败。毛主席指出：“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毛主席的这一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实质和社会根源，指出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戳穿了苏修叛徒集团鼓吹的“全民国家”的谎言。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命强化他们的法西斯专政机关。他们不仅用最新式的科学

技术手段装备警察特务机关，加强对人民的镇压，而且在工厂、农庄、机关、团体里广泛地建立特务组织，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严密的控制。今日的苏联，已完全为白色恐怖所笼罩。只要谁对勃列日涅夫一伙流露不满，敢于反抗斗争，就会被监视、盯梢、传讯或送进“精神病院”，就会被加上“诽谤苏联国家和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关进集中营或监狱。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除了用赤裸裸的暴力镇压人民以外，还用软刀子杀人，把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最腐朽的文化、艺术和糜烂的生活方式移植过来，毒害苏联人民。世界上一切意识形态方面最为落后、反动、腐朽的东西，都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里找到了适宜繁殖的土壤。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极度寄生性和腐朽性还表现在，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津贴，占有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而且依靠其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过着荒淫糜烂的寄生生活。同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紧密相联的，还有一个修正主义精神贵族阶层。这些修正主义精神贵族，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样过着荒淫的寄生生活。以宣扬战争恐怖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而臭名远扬的作家肖洛霍夫已成为亿万富翁，他不仅有私人汽车，而且有私人飞机，银行存款多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

总之，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到处都散发着一种腐朽的社会制度的糜烂气息。这种社会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内血腥压迫和剥削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对外向“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向世界各地到处侵略扩张，这就必然使得它在国内和国际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必然要遭到苏联劳动人民的反抗，使苏联劳动人民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苏联人民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苏联许多地方的工人以怠工旷工和罢工的形式，表示他们对苏修统治集团的不满和反抗。不少地方，革命群众多次举行抗议示威，反对苏修当局的法西斯专政。苏联各地经常有人出版地下刊物，散发各种传单，抗议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揭露苏修特权阶层的黑幕。十月革命的英雄儿女是决不会屈服于苏修新沙皇的反动统治的。列宁在老沙皇的黑暗统治下，曾经满怀信心地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不惜任何牺牲，要使全人类摆脱沙皇君主制度的凌辱**”。今天，苏联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必将响应列宁的号召，为推翻新沙皇，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其次，受到苏修新殖民主义迫害的那些国家和人民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在日趋激化。

苏修推行“经济一体化”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对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进行奴役和掠夺，促进了这些国家反掠夺、反控制斗争的发展。苏修悍然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更加擦亮了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人民的眼睛，加强了他们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今日的东欧，活象一个火药桶，总有一天要爆发。苏修坦克开进布拉格，绝不表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强大，恰恰是苏修殖民帝国开始崩溃的征兆。

苏修打着“援助”的旗号，对亚、非、拉各国进行疯狂渗透、掠夺和侵略，把自己置于同亚、非、拉人民相对立的地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魔掌，已伸进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国家，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攫取港口使用权，控制和干涉各国内政和外交。苏修的海洋渔船到处横行，掠夺和破坏别国的渔业资源，侵犯别国领海主权。亚、非、拉人民日益认清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他们严正地指出，苏修叛徒集团是“世界革命人民的

叛徒”、“新殖民主义者”、“世界人民的又一个公敌”。受到苏修和美帝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正在联合起来，胜利地开展反帝、反殖的斗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的斗争。

第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疯狂地对外侵略扩张，到处伸手，抢夺商品市场、原料基地和投资场所，这就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苏修同美帝这两个妄图主宰世界的超级核大国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起来。

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因为欧洲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地区，是两霸必争之地。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但是，中国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苏修把陆军和空军的三分之二的力量驻扎在乌拉尔以西。苏修海军近十年来急剧膨胀，一九七〇年出动二百多艘舰只，在三大洋和八个海域举行全球性的海洋大演习，炫耀海上实力，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区扩张。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美苏争霸世界，越来越受到第三世界的强烈抵抗，同时引起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不满。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陈兵中国边境，妄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务必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警惕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警惕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毛主席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第三世界觉醒和壮大了。这是当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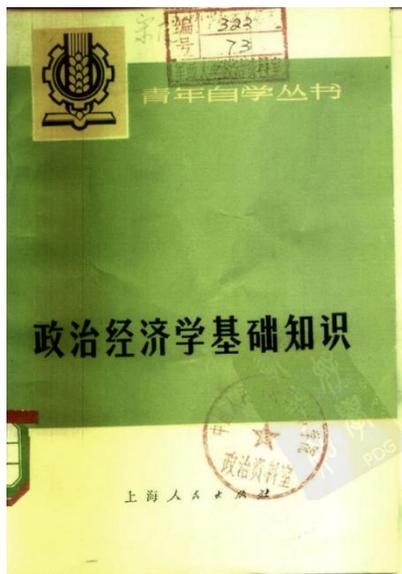
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正是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现。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日益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股巨大的历史潮流势将席卷美苏两霸以去。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曾经预言：“**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暂时的曲折。但是，它同资本帝国主义一样，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苏联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矛盾，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殖民地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同资本帝国主义特别是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在越来越激化。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必将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去。列宁曾经断言：“**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第二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毛主席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具有十月革命光荣传统的苏联人民，在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必将最后埋葬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社会主义的光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重新普照苏维埃的大地。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

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原书插图



说明

本版《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是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编辑小组（星火出版社）按照网上流传的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12 月第二版的 PDF 文档 OCR 并重新排版的。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纰漏，请同志们踊跃反馈。有意印刷或二次排版的也可与我们联系。

联系方式：zcr09@outlook.com mebk_org@hotmail.com